

三联生活周刊
LIFE WEEK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e-only 电子书
行走土耳其
东方国家的西方基因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三联生活周刊e-only系列

# 行走土耳其

浙版数媒

# 版权信息

行走土耳其（三联生活周刊e-only系列）
三联生活周刊 编著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4
本书版权为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5065-20141023
最后修订：2014年12月23日
Kindle版制作：许阳洋

出版：三联生活周刊
北京 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BookDNA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

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4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 目录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简介

内容简介

行走土耳其

安纳托利亚战场寻踪：战争史里的土耳其

从奥斯曼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答案

这个国家的细部与细节

被管理的现代性：建立与逆转

#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简介

“三联生活周刊e-only杂志书系列”是周刊为kindle用户量身打造的电子版读物。

三联生活周刊对品质生活、文化现象、时代人物、儿童教育……重要领域保持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体系。我们把对特定领域多年的观察和记录，经过重新编辑、完善，形成具有鲜明主题和丰富内容的系列电子读本，以满足读者深入了解特定话题的需求。

# 内容简介

曾几何时，作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土耳其一直被西方誉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楷模。正义与发展党的胜利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在随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当中，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情况，和正义与发展党如出一辙。这一变故让很多人不知所措，不晓得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这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又名小亚细亚。这里靠近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又是欧亚大陆的交汇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块地方历史上战争不断，王朝更替频繁，交战双方的历史背景也十分多样化。《安纳托利亚战场寻踪：战争史里的土耳其》在战场里寻找战争的痕迹，认识这一区域的历

史。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部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这种模式，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从奥斯曼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答案》梳理了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坦齐马特时代到今天的土耳其的历史。

# 东方国家的西方基因



伊斯坦布尔索菲亚大教堂

# 行走土耳其

◎袁越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里有一张巨幅油画，画的是突厥攻长城的情景。这幅画的主角自然是英勇的突厥武士们，在他们深邃的目光注视下，城墙上浓烟四起，眼看就要被攻克了。

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观察长城，并试图体会一个北方草原上的游牧者看到长城时的心情。看着看着，我感觉历史教科书上的文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衡量战争是否正义的标准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

几百年后，这场战役的交战双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原帝国日趋强盛，中华文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这个世界上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展时间

最长的古老文明之一。突厥人则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朝着日落的方向走去，最终在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安纳托利亚半岛找到了栖身之地。这一路走得很辛苦，他们放弃了自己祖传的宗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又在和沿途遇到的各种部落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丢掉了自己的大部分传统。但有一样东西没有丢失，那就是打仗的技能，凭借这祖传的绝技，突厥人的后裔南征北战，最终统治了西亚、东欧和北非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当时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和奥斯曼帝国媲美的，正是中国。

又过了几百年，西欧崛起。在启蒙运动的引导下，西欧人发现了科学和民主这两样法宝，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却同时在走下坡路，这个世界的话语权逐渐落到了西方人手里。但是，没有比较就分不出好坏，而文化是很难比较的，只有

战争才会分出输赢。先是奥斯曼人在和俄罗斯的对抗中吃了败仗，紧接着中国人也在鸦片战争中被击败，其结果就是，前者被沙皇称为欧洲病夫，后者被欧洲人称为亚洲病夫，这对冤家又聚在了一起，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落后就要挨打，要想进步就必须改革。奥斯曼的精英们为了挽救帝国的命运，尝试过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试图用帝国的荣誉和宗教的力量来团结帝国的臣民，一同对付强敌，但两次尝试都失败了。就在帝国即将被西方列强肢解的危急时刻，一位年轻的奥斯曼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站了出来。他坚信奥斯曼帝国早已病入膏肓，任何小修小补都无济于事，必须先跳入火堆，然后期待涅槃重生。他认为必须彻底改变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因为他相信一个旧体制是无法催生出一个现代国家的。接着他又把刀口对准了伊斯兰教，因为他

坚信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科学民主的理念互相矛盾，两者无法共存。



土尔其军事博物馆门前，身穿奥斯曼士兵传统服装的表演者正在演奏

他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奥斯曼人，但却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奥斯曼将军。因为打仗勇敢，凯末尔

为帝国立下了赫赫军功。他依靠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威信，率领一群勇敢的士兵打赢了解放战争，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安纳托利亚半岛近百年来最强势的独裁者。无限的权力给了凯末尔充分的条件去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他连出三刀，第一刀砍向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奥斯曼苏丹体制，逼得帝国最后一位苏丹连夜出逃。第二刀砍向了哈里发制度，把伊斯兰教彻底从国家权力体系中清除了出去。第三刀砍向了奥斯曼人的文化传统，强行修改了伊斯兰历法，强迫土耳其男人扔掉传统的费兹帽，要求所有土耳其人都要有姓，他还强力推行文字改革，取消了奥斯曼帝国的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来标注突厥发音。

所有这些事情，清朝中国的改革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过尝试，但都没有土耳其做得那么彻底。

但是，凯末尔保留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民族主

义。一来他必须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来团结民众，而民族主义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是团结民众最有效的法宝。第二，所有试图迈向现代化的东方国家都存在一个悖论，那就是如何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凯末尔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他放弃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标签，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突厥传统作为土耳其的民族图腾，为此他甚至不惜编造了一个突厥传统，把西方文明的源头也算在了突厥祖先的头上。

民族主义不只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一个行动准则。凯末尔赶走了境内的异族人，强迫所有国民从思想到生活方式全部变成土耳其人，此举不但让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还遗留下了库尔德问题，至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块心病。

凯末尔的改革一开始是非常成功的。土耳其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国内局势迅速稳定了下

来，国民经济稳步增长，文盲数量急剧下降，整个国家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正轨。但是，凯末尔实行的现代化改革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精英改革，或者套用一句政治学术语，凯末尔带给土耳其的是一种“被管理的现代性”，一旦政治环境发生改变，这种“被管理的现代性”必然受到挑战。



描绘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的插图作品

因为多年的戎马生涯损害了凯末尔的身体，他在5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此时土耳其共和国刚刚度过了自己15岁的生日，照理说条件尚未成熟。但凯末尔去世后不久，他的继任者就开放了党禁，举行了总统直选，正式拉开了民主制度的序幕。果不其然，土耳其的民主制度进行得并不顺利，从那时到现在，凯末尔党从来没有真正赢得过一次大选，获胜者都是偏向伊斯兰教的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几乎每隔10年就要来一次军事政变的原因，亲凯末尔的土耳其军队先后三次动用武力赶走了伊斯兰党总统，保卫了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进程。这种情况直到2002年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亲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获胜，该党主席埃尔多安运用高超的政治手腕成功地控制了军队，杜绝了军

人干政的现象。但是，在西方某些人看来，此事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复辟了。

曾几何时，作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个采用民主制度的国家，土耳其一直被西方誉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楷模。正义与发展党的胜利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在随后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当中，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情况，和正义与发展党如出一辙。这一变故让很多人不知所措，不晓得应该支持还是反对。

实际情况到底怎样？这就必须亲自去土耳其看一看。我花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土耳其的主要城市，仔细观察了土耳其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东方国家或者说传统国家如何现代化？土耳其尤其是凯末尔道路，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模式，这种稍显极端的“世俗主义”何以被选择，在行走土耳

其的过程中，实则我们得回到这个国家本身，去发现他的历史。

# 安纳托利亚战场寻踪：战争史里的土耳其

◎袁越

土耳其一定是所有历史系学生的噩梦。这个国家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又名小亚细亚。这里靠近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又是欧亚大陆的交汇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块地方历史上战争不断，王朝更替频繁，交战双方的历史背景也十分多样化。因此，要认识这一区域的历史，在战场里寻找战争的痕迹，便是一种方法论。这是我行走土耳其的线路与思路。

## 特洛伊之战

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有一批刻着楔形文字的泥板，其中有公元前1757年的房屋买卖契约、公元前2035年的离婚契约，甚至还有一块刻于公元前2030年左右的人类最早的爱情诗。但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是一块20厘米见方的残缺不全的小泥板，放置在一个单独的玻璃柜里。泥板本身已经碎成了好几块，被考古学家重新粘在了一起，看上去非常寒酸，很多游客都忽略了它的存在。

这是一份签署于公元前1269年的和平条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停战协定，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末期。和约的签约方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王朝，一个是古埃及的拉姆西斯王朝，他们把条约刻在了埃及古都底比斯的一座神庙的墙上，另一个是安纳托利亚的赫梯王朝，他们把条约刻在了这块泥板上。泥板记事法源自苏美尔人，这个民族诞生于两河流域（现今伊拉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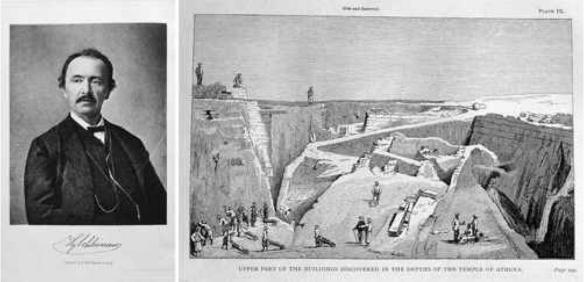
公认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发明了楔形文字，这是人类已知的最早的文字系统。中东地区的两大王朝——赫梯王朝和巴比伦王朝均采用了这种象形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虽然他们使用的语言和苏美尔语是不一样的。

赫梯、巴比伦和古埃及这三个当时最强大的王朝连年相互征战，共同上演了一出中东版的“三国演义”。赫梯王朝之所以签署这个和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腾出手来对付波斯人的入侵。而古埃及人也有后顾之忧，他们必须防范“来自海上的敌人”——希腊人。聪明的希腊人擅长航海，并掌握了铁器的制造技术，是这一地区的新生力量，它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三国鼎立的格局。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为了讨回一位名叫海伦的美女，向位于安纳托利亚南部的特洛伊城发动了进攻。这场战争被诗人荷马写进了史诗《伊利亚特》，后来又

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成为人类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一场古代战争。

这场战争真的发生过吗？起因真的是因为海伦吗？特洛伊木马真的存在过吗？考古学家对此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而特洛伊古城的遗址也一直没有找到。1868年，一位名叫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德国业余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后得出结论，特洛伊确实存在，其位置大概在达达尼尔海峡入海口往南30公里处的一座小山丘之下。谢里曼从小就对古希腊神话十分迷恋，长大后他在美国经商赚了很多钱，退休后决定自费寻找特洛伊古城。他以分享出土文物为诱饵，从奥斯曼帝国政府申请到了许可证，雇用附近的村民开始了挖掘工作。事后证明，这个谢里曼的目的并不纯粹，他真正的兴趣不是考古学，而是特洛伊国王留下的珍宝。因此，他的整个挖掘工作进行得非常业

余，不但毁坏了大量珍贵的古迹，而且在古迹的鉴定方面也犯了不少错误。不过他真的挖出了不少金银财宝，为了掩人耳目，他给村民们放了几天假，然后自己偷偷地把这些珍宝挖出来并带到了国外，很多财宝如今都已下落不明。



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及其手绘的特洛伊遗址发掘现场

　　后来又有几批真正的考古学家前来挖掘，发现这里竟然埋藏着9座古城。最早的城墙大约出现在

公元前3000年，直径只有90米。后来的居民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扩张，城墙像洋葱一样不断扩大，直到罗马时期，也就是公元500年左右，这块地方才最终被遗弃，不再有人居住了。

如今这里已被开辟成了特洛伊遗址公园，每年有6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公园入口处有个用木头建造的木马模型，做工相当粗糙，但还是吸引了很多小孩爬上去照相，在木马肚子里流连忘返，因为正式的展品实在是太没有看头了。当年谢里曼在挖掘过程中毁了太多东西，如今的古城遗址只剩下几段残缺不全的城墙，砖缝间长满杂草，幸亏有导游讲解，我才看出了一点门道。比如，早期的城墙十分低矮，但从特洛伊时代开始城墙突然增高，平均高度超过了10米，而城门居然开在城墙拐角的内侧，进出一定很不方便，但这种设计让古时的战车没办法顺利通过，给攻城者带来了更大的

不便。这个设计说明，自特洛伊的时代开始，这块地方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经历过多次战争，甚至现在还能看到城墙被火烧过的痕迹。



电影《特洛伊》中使用的木马道具

我登上小山向四周望去，古城周围是平整的农田，一直延续到海边。据说这附近原本有一条河，

这块平原就是河流冲刷下来的泥沙慢慢淤积而成，也就是说，特洛伊城所在的位置在古时候更靠近海边。我再向西北方向望去，爱琴海泛着蓝色的波光，达达尼尔海峡的入海口隐约可见。这是从地中海通往黑海的第一个关口，一旦控制了此处，南欧和东欧之间的海上交通就会切断。

“大家的脸上感觉到风了吗？这就是地中海季风，当年的商船就是在这股季风的推动下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的。”导游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如果季风方向不对，商船队就只能停靠在这里等风，特洛伊城就是这么逐渐发展起来的。”

这位导游原本是住在附近的一位农民，自从特洛伊公园建成之后，他便把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开了家旅游商店，生意做得挺红火。他又自学了特洛伊历史和英语，考了个导游证，当上了专业导游。

按照他的说法，特洛伊之战确实发生过，但绝对不是因为什么美女海伦，而是为了争夺这个海上交通要道，以便进一步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和渔业。“我们都喜欢传奇故事，但真正的历史一点也不浪漫，只有对财富赤裸裸的渴望，以及由此引发的血淋淋的战争。”

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战争就是历史事件最重要的推动力。安纳托利亚作为旧世界的中心，又是多条贸易路线的必经之地，战争更是没有断过。特洛伊之战曾经被一位名叫阿齐兹·阿提亚（Aziz Atiya）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称为是东西方冲突的鼻祖，是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势力对亚洲发动的第一次侵略。事实上，希腊人正是在特洛伊取得胜利后，顺势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地区，将其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并且统治了400多年。公元前547年，波斯皇帝居鲁士（Cyrus）发动进攻，将

希腊人赶出了安纳托利亚。但是，波斯人对这块土地的统治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安纳托利亚居民不断奋起反抗。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借口希腊人煽动叛乱，出兵攻打希腊，两军在希腊城市马拉松展开激战，希腊人获胜，一位士兵从马拉松一口气跑到雅典报喜，最后被累死了，这就是马拉松跑的起源。

让我们再回到特洛伊。根据希腊神话的说法，当年希腊人依靠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后，在城里大肆屠杀，一批幸存者逃了出来，搭上一条小船一路向西，最终漂到了罗马，并在那里安营扎寨，最终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帝国——罗马帝国。

不过，在罗马帝国起事之前，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军队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把波斯人赶出了安纳托利亚。但是亚历山大大帝不善于管理国家，安纳托利亚很快就变成了军阀混战的战场，

直到强大的罗马帝国最终一统天下。

罗马人最先占领的是靠近爱琴海的这片地区，特洛伊古城遗址挖出过很多古罗马时期的石柱和石碑残片，甚至还挖出了一个小型的罗马式剧院，看得出罗马人对自己的起源之地还是挺留恋的。不过，就在罗马人离开沿海地区向安纳托利亚中心进发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对手——基督教。

## 卡帕多西亚的宗教战争

如果说安纳托利亚是旧世界的中心，那么卡帕多西亚就是安纳托利亚的中心。这块地方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中心地带，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周围被群山围绕，山谷中遍布着奇形怪状的石林，当地人称其为“仙人烟囱”。从高空热气球上往下

看，你会觉得自己正驾驶宇宙飞船访问一个外星球，行走在其间，你又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难怪这里被公认为是土耳其最有名的旅游胜地，是来土耳其旅游的必经之地。

卡帕多西亚气候干燥，土壤贫瘠，交通不便，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多年来一直人烟稀少。大约在2000年前，一群人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搬来此地安营扎寨，他们就是最早的一批基督徒，追杀他们的，就是罗马帝国的士兵。

公元前133年，罗马军队跨过达达尼尔海峡，横扫了整个安纳托利亚，把罗马帝国的疆界拓展到了亚美尼亚和波斯王国交界的地方。此后，奥古斯都大帝登基，罗马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而新生的基督教则在罗马军队的眼皮底下开始了艰难的传播。

基督教的前身是犹太人信奉的犹太教，这是一

种地方性宗教，视耶和华为犹太民族唯一的保护神。这一时期的犹太教非常入世，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道德宣教。但此后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注重来世和报应等出世观念的神秘主义宗教，基督教就这样诞生了。

《全球通史》一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基督教的这一变化是它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的关键。基督教和几乎同时代的大乘佛教具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注重灵魂拯救，允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第二坚持平等主义，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在公元后的若干世纪内，欧亚大陆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很多人居无定所，心无所依，基督教给教徒们提供了精神安慰，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基督教徒都是些地位低下、无所皈依的人的原因。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也是在中国汉朝崩溃后全国处于混乱状态，人世间的一些问题找不到

解答时而取得的。

精神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去卡帕多西亚的地下城看一看就知道了。当年的那批基督徒为了躲避罗马军队的追杀，不得已躲入地下，日积月累，竟然把地下几乎掏空了，使之成为一座地下城市。我跟随一个旅行团参观了现存最大的德林库（Derinkuyu）地下城，从上到下一共有11层，只有最上面的8层对外开放，最深处距离地面85米。地下城的入口处十分狭窄，仅容一人通过，个子高的甚至要弯腰，但进入房间后，空间豁然开朗，和正常的房间没有什么两样。



为躲避罗马军队追杀，当年的基督徒逃入地下。图为共有11层的卡帕多西亚德林库地下城

再往下走，过道越来越矮，有些地方只有1米左右，必须把腰弓成90度才能通过。各条地道之间纵横交错，如迷宫一般，出现了大量死巷和死角，显然是为了便于和敢于来犯之敌拼杀。越往下走，房间就越小，但如果仔细分辨，还是能看出各个房

间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些房间里尚留有泥做的长条桌子，显然这是教徒们集体用餐的地方；有的房间一侧建有神龛，显然是教徒们做礼拜用的临时教堂；还有的房间里能看到水槽的痕迹，这是榨取葡萄汁做酒的作坊。《圣经》里说，葡萄酒代表耶稣的血，饮酒是基督徒的必修课。

如今整座地下城全部由电灯照明，但仍然让人觉得阴森森的。当年的基督徒们只能用动物脂肪做的蜡烛照明，想必更加昏暗。地下城里湿气很重，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味道，让人很不舒服。据导游介绍，当时的地下城里不但住满了人，牛羊等家畜也得跟着进来，人畜共处一室，那味道肯定好受不了。如果地面上的敌人不撤的话，基督徒们就得一直躲在地下，有时甚至要躲半年以上，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相比之下，我们的导游穆罕默德就世俗多了。

他今年只有26岁，虽然名义上是穆斯林，但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穆斯林非常不一样。“对我来说伊斯兰教就是一种信仰而已，对于我的生活没什么约束力。”他对我说，“比如穆斯林照理说是不能喝酒的，但我喜欢喝酒，经常偷偷买酒回家喝。我也不喜欢现在的总统，我觉得他并不是真信，而是利用宗教替自己拉选票，动机很可疑。”


在尚勒乌尔法街头下象棋的市民

他还告诉我，因为近几年宗教势力回潮的缘故，这一届土耳其政府的大部分高官都来自卡帕多西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开塞利，这座城市的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商店里不准卖酒，但实际的人均酒精消费量却在土耳其各大城市里排名第一。

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位导游和同龄的中国小镇

青年十分相像。他讨厌美国，相信阴谋论，认为美帝国主义和欧盟勾结起来欺负土耳其。他抱怨房价太高，物价太高，医疗费用太高，而自己工资太低，每个月只有800土耳其里拉（1里拉约等于3.5元人民币）。其实谁都知道，导游们是不靠工资生活的，从事后大家给他的小费来看，他每个月都至少能拿到3000里拉的额外收入。

当晚在小镇格雷梅（Goreme）过夜。这是卡帕多西亚的游客中心，有很多建在石头里的廉价旅馆。当地人在仙人烟囱里掏个洞作为栖息之地，每间石屋只在顶部留有一个小窗户，从外面看很像童话，但其实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不但空气糟糕，而且采光不好，被子和床单潮乎乎的，闻上去有一股霉味。

游客们之所以来格雷梅，是为了参观附近的露天博物馆。这是安纳托利亚最有名的景观，早在

1985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评为世界级文化遗产。这是一组建在石头里的教堂，从外面看和当地人的石头屋子差不多，但石头里面几乎被掏空了，还凿出了神龛和座椅，屋顶也设计成圆拱形的，布置得和一般教堂几乎没有区别，当年的基督教徒们就是躲在这样的教堂里做礼拜的。

这些教堂最值得看的就是屋顶的宗教壁画，无论是色彩还是线条都极为精美，堪称艺术珍品。其中一座教堂因为窗户很小，光线很暗，被称为“黑暗教堂”，但恰好是因为光线暗，墙上的壁画被保护得很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色彩依然鲜艳如初，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也有不少壁画遭到了罗马人的破坏，墙上留下了人为涂抹的痕迹。好在罗马帝国因为内战等原因，很快就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的古城

拜占庭定为首都，并于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下一任皇帝狄奥多西更进一步，将基督教定为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两位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正是看中了基督教提出的“一个上帝”的理念。与崇拜多神的希腊罗马诸多教派相比，基督教更能团结人心，帮助统治者共同维护新帝国的稳定和统一。而基督教这个源自东方的宗教，也正好借助这一机会堂而皇之地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逐渐向西扩散，最终成为整个欧洲大陆人民的共同信仰。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拜占庭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而他一手创立的这个新的东罗马帝国却又因为这座首都而被后人称为拜占庭帝国。有趣的是，西罗马帝国因为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于公元476年灭亡，但拜占庭帝国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比西罗马帝国多活了1000多年。不少基督徒相信，正是由

于基督教的团结作用，才使得拜占庭帝国如此长寿，但更多的历史学家则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源自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相比之下，拜占庭帝国仰仗着安纳托利亚肥沃的土壤，以及便利的贸易条件，从印度、中亚和中国等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才是拜占庭帝国长寿的关键所在。

换句话说，如果在那段时期讨论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优劣，胜出的一定是东方。

事实上，基督教徒们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身处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伊斯兰教，它更加适应新的时代，很快就代替了基督教，成为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新信仰。

## 塞尔柱王国的诞生

我从格雷梅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向西南方向驶去。因为有多家运输公司参与竞争的缘故，土耳其的长途汽车服务质优而价廉，不但车次多、速度快，而且车辆内部都非常干净，每个座位都有单独的个人娱乐系统，看电影时不用担心影响他人。车上还配备一名服务生，为乘客免费送茶水和饼干、面包等小吃，有些运输公司甚至提供免费无线网服务。

大约5个小时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山脚下的土耳其南部重镇科尼亚（Konya）。这里土地肥沃，降水适中，适合种植小麦，是土耳其著名的面包篮子。科尼亚市中心非常干净，马路上车辆虽多，但大家都很从容，秩序井然。科尼亚旅游局派了一位年轻的导游尤塞尔负责接待我，他和上一位导游穆罕默德正相反，是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热爱突厥文化，认为凯末尔的文字改革政策割裂了奥斯曼帝

国的历史，非常糟糕。后来我得知，他其实是个自学成才的历史学者，尤其对东方史很有研究。他非常推崇日本，认为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同时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是东方国家的典范。

“一个日本朋友曾经对我说，土耳其人和中国人非常像，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爱发火。”他对我说，“我曾经去日本住过一段时间，这才意识到中国和土耳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出了点问题，平衡没有掌握好。”

他带着我参观了塞尔柱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至今还在使用，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休息、祷告，甚至可以躺在地毯上睡大觉。清真寺外表看不出什么特点，内部装饰也十分简朴，但屋内的几十根支柱却让人眼前一亮。这些支柱都是用大理石做成的，表面刻着复杂的花纹，和一般清真寺简朴的设计格格不入。

“这些柱子都是罗马人留下的，塞尔柱人从罗马建筑上拆下来，用在了清真寺里。”尤塞尔说。

塞尔柱人的祖先是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突厥人，一直被欧洲人看做东方蛮族之一。公元7世纪，突厥人开始了大规模西迁，顺着阿富汗境内的一条绿色走廊进入了中亚地区。这些突厥人本身属于游牧民族，文明水平相对较低，但个个英勇善战，被沿途的阿拉伯和波斯贵族征用，充当雇佣军，与拜占庭军队作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突厥人逐渐占领了原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疆域，最终成功地脱离了雇主，建立了塞尔柱突厥国。有意思的是，当年另一支“蛮族”日耳曼族也是依靠给罗马人充当雇佣军而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并趁主人日渐式微之际，反客为主，逼得罗马帝国皇帝交出了统治权。

按照《全球通史》的分类法，公元3～6世纪是

所谓的“蛮族入侵”时代，来自东方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向四面八方迁徙，搅乱了欧亚大陆其他文明国家的社会秩序。这些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沿着经度的方向自北向南，入侵中国和印度等地。但是由于南北方向的气候差异较大，植被相似度低，移民们不容易适应，再加上当时中国和印度已经掌握了稻米的种植技术，粮食充足（稻米单位面积出产的卡路里总量是小麦的5倍），因此中印两国人口稠密，入侵者人数太少，很快就被中国人和印度人同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印两国的文化延续性保持得非常好，一个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汉代人，如果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复活过来，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因为汉、唐这两个朝代的民族成分和官方语言都是一样的，政治制度和尊孔尊儒的思想也没有变。

西欧的情况则正相反，本来人口就不多，再加

上纬度的相似性，使得入侵的蛮族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如鱼得水，最终导致欧洲古典文明彻底崩盘，被另一种崭新的文化所取代。但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文明才得以彻底摆脱了古典文化的沉重包袱，轻装上阵，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东地区历史悠久，农业发达，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文明的发展程度都和中印相似，所以外来蛮族基本上被本地人同化了。比如，突厥人就在西进的过程中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这就是刚刚诞生不久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后诞生的宗教，修改了其他宗教的错误，更加准确地表达了真主的意思。”尤塞尔告诉我，伊斯兰教虽然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但《圣经》经过很多人的修改，有相当一部分都已不是真主的原话了，而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直接记录了真主的原话，写成的《古兰

经》是真主思想的最忠实的记录，比《圣经》更准确。

“全世界有很多个版本的《圣经》，会把人搞糊涂的，而全世界所有的《古兰经》都是一样的，一字不差。”尤塞尔说，“基督教除了上帝外，还崇拜很多次要的神，而伊斯兰教只崇拜一个神，比基督教简单多了，更适合在文化水平不高的穷人当中传播。”

伊斯兰教于公元632年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游牧民族，“Islam”这个单词的本意为“服从真主的旨意”。伊斯兰教没有专门的教士组织，教徒们只要做到“五功”（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即可成为合格的穆斯林，无需其他条件。沙漠地区生活条件艰苦，但却是极佳的藏身之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曾经以麦地那为基地，不断袭击麦加商队，得手后就逃进沙漠，躲避

军队的追击。伊斯兰教教义简单易懂，特别强调平等和忠诚，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信仰，更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制度，对日常生活具有指导意义，尤其适合战士的生存状况，这就是为什么骁勇善战的突厥人果断地抛弃了原来的信仰，迅速地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原因。

被伊斯兰教武装起来的塞尔柱突厥士兵于1071年在曼齐克特（Manzikert）和人数远多于自己的拜占庭军队打了一仗，大获全胜，活捉了拜占庭国王。这场战役被认为是中东地区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突厥人正式进入了安纳托利亚。虽然此后由于十字军东征等原因，第一个塞尔柱王朝没有存在太久，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于公元1150年建都科尼亚，把塞尔柱人的传统发扬光大。

这一时期的塞尔柱人非常注重吸收各民族的优

秀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这是突厥人得以在中东地区站稳脚跟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尤塞尔领着我参观了科尼亚瓷砖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塞尔柱人制造的瓷砖，明显吸收了来自东方和古罗马帝国的制造技术，表面装饰颜色鲜艳，人物造型逼真。这个博物馆最早是塞尔柱人的高等学府，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这里互相交流，共同研究。博物馆旁边就是一个当时中东地区最大的天文观象台，虽然内墙上的一部分瓷砖已经脱落，但仍然能感觉出当年的美轮美奂。

但是，科尼亚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却是一位宗教人士的陵墓。原来，作为现存古典宗教中最世俗化的一个，伊斯兰教在精神层面的指导相对欠缺，不利于传播。穆斯林在扩张的过程中占领了很多原本属于基督教的地盘，一些虔诚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给了一部分穆斯林极大的启发，于是他们

在伊斯兰教内部发展出一个新的派别，后人称其为苏菲神秘主义（Sufism）派别。这一派强调心灵净化，认为穆斯林只要能够摆脱世俗物质社会的影响，追求内心的宁静，就能更快地接近真主，到达极乐世界。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内展示的一幅突厥攻长城的实景油画

苏菲派内部也分出了不同的派别，其中最重要的一派叫做鲁米派，其创始人梅乌拉那·鲁米（Mevlana Rumi）就是在科尼亚一举成名的。此人于1207年出生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一个波斯小城，此后跟随家人来到科尼亚定居。他从小就十分

聪明，加之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科尼亚最有名的伊斯兰学者。他尤其擅长写寓言诗，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传达深奥的道理。后来他干脆成立了自己的教派，广收门徒，传播他的思想。

简单来说，鲁米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爱”，这是宇宙的中心思想，一个人要想参透其中的真谛，就必须忘掉自我（Ego），刻苦修行，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鲁米制定了一套严格的收徒程序，想当他徒弟的人必须先住在清真寺观察三天，确认自己愿意吃苦，才会被接纳为候选人。此后这位候选人必须接受1001天魔鬼式的训练，其中包括劳动和读书。之后通过考试，合格了方能成为正式弟子。

训练课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旋转舞蹈。鲁米认为世间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转动，所以人也要跟着旋转才能领会宇宙的真谛。旋转舞者通常身穿白色长

袍，头戴鲁米派标志性的高帽子，一边旋转身体一边缓慢地抬起双手，长袍的下摆扬起，成为一个锥形，姿势极为优雅。

鲁米于1273年死于科尼亚，死后被葬在一间清真寺内，如今这座清真寺变成了鲁米博物馆，是全世界鲁米派的朝圣之地。虽然鲁米派被归为苦行僧，但这间博物馆却是金碧辉煌，陈列着鲁米生前用过的各种金银铜器，穿过的丝绸长袍，以及若干本镶着金线的《古兰经》。而鲁米发明的旋转舞也成了科尼亚，乃至整个土耳其的一个旅游项目，科尼亚政府专门修建了两座各能容纳2500人的旋转舞馆，一座是室内的，只在冬天开放，一座是露天的，负责在其余三个季节满足游客们的好奇心。

“鲁米派不但影响了塞尔柱罗姆苏丹国，更是对后来的奥斯曼帝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是土耳其人的精神源泉。”尤塞尔告诉我，“奥斯曼帝国

虽然依靠武力征服了许多周边国家，但对异族文化一直相当宽容，从不要求对方改变自己，这一点和后来的欧洲殖民者有着根本的区别。”



一幅画中描绘的伊斯兰教鲁米派创始人梅乌拉那·鲁米

不管鲁米派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奥斯曼帝国对待异族文化的宽容却是真的，这是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成事的重要原因。

# 奥斯曼帝国的诞生

塞尔柱突厥王朝只存在了大约100年，就被另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打败了。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像狂风扫落叶一般横扫安纳托利亚，把塞尔柱王朝打得七零八落。虽然蒙古人并没有在这里久留，但塞尔柱王朝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分裂为10个突厥小公国，安纳托利亚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期。

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奥斯曼部落就是这10个突厥小公国之一。这个部落本来实力不强，老首领死后，新任部落首领奥斯曼（Osman）娶了一位伊斯兰教苏菲派长老的女儿为妻，被授予“伊斯兰教圣战者”的头衔。1299年，奥斯曼宣布脱离塞尔柱君主的统治，正式独立。奥斯曼以伊斯兰“信仰武士”自居，率领手下众将东征西掠，开创了奥

斯曼帝国600年的江山。

奥斯曼军队攻下的第一座重镇就是位于马尔马拉海峡东岸的布尔萨（Bursa），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行政中心，但是因为拜占庭国力衰落，布尔萨守军基本上未做抵抗，就将这座兵家必争之地拱手相让。布尔萨位于一座大山的脚下，因为山泉的滋润，这块土地异常肥沃。突厥人向来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安营扎寨，奥斯曼立刻喜欢上了布尔萨，将其定为帝国的第一个首都。有了布尔萨作为基地，奥斯曼的军队就可以方便地跨过马尔马拉海峡，将触角伸向欧洲大陆。

我从科尼亚出发，乘坐长途车于周五傍晚到达布尔萨，此时正赶上晚高峰，路上堵得很厉害，来车站接我的内贾德·雅和亚（Nejat Yahya）告诉我，布尔萨这两年城市扩张的速度惊人，平均每年向西扩展6公里，基础设施有点跟不上了。

内贾德是一位商人，早年间和中国做生意发了财，是布尔萨的中国通。他开车带我在城里兜了一圈，布尔萨老城保存了大量古建筑，城内绿树成荫，环境很美。但是，就在一片低矮的老房子中间，突然出现了几幢高达20多层的塔楼，塔楼尚未完工，黑洞洞的窗口格外显眼。内贾德告诉我，这几幢楼建了三年还未建好，开发商原本答应给每位拆迁户补偿两套房子，但合同签好后拆迁户们又反悔了，想多要一套房子，开发商只好在原来的设计上又加了5层，这么一反复，工期就被无限拉长了。

看来，拆迁户和开发商之间的博弈是东方国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过的一道坎，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古城中心有座古老的清真寺，逛到这里时正好赶上了晚祷时间。听到喇叭里传出的诵经声，内贾

德决定进去做个祷告。清真寺里挤满了人，绝大多数都是成年男性，屋子中央有个水池，祷告的人先在这里净手，然后面对麦加的方向站成一排，随着指令一起跪下叩拜。有个小男孩没有跟随大人一起拜，他看了一会儿就厌倦了，背过身去自己和自己玩起了游戏。整个叩拜过程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与基督教徒做礼拜相比，清真寺内的气氛相当随意，也比教堂安静了许多。

“你祷告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内贾德。

“我刚才想的是我的家人，希望真主保佑他们平安。”内贾德回答，“我们穆斯林和基督徒、佛教徒或者其他任何人相比没什么两样，祈祷的内容无非是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这类生活中的琐事，大家都是很功利的。”

内贾德告诉我，土耳其穆斯林大都属于逊尼

派，是伊斯兰教中比较温和的一派，这一派的教义很像社会主义，提倡均贫富，顺应了当时的民意，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苏菲派教义的影响更是让奥斯曼人对于被征服的民族相当宽容，从不要求对方皈依伊斯兰教，只要宣誓效忠奥斯曼帝国，服从苏丹的管理，并按时缴税就行了。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头领，对内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管理，甚至在奥斯曼军队中都有专门的基督徒军队，当然他们必须服从苏丹的指挥。

现在看来，奥斯曼人这么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像突厥这样的游牧民族，其特点就是善于打天下，不善于坐天下。尤其是被征服地区大都是农业或者商业社会，更是游牧民族完全未知的领域。历任奥斯曼苏丹们都深知这一点，他们必须利用被征服的民族原有的经济文化制度和管理能力，才能应

付得了如此庞大的疆土。他们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依靠武力征服更多的土地而已，其他的不用太操心。



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中的澳新军团士兵在战争间隙修整

尚武是突厥民族的传统，突厥小孩从懂事起就在马背上度过，骑马射箭是突厥男人的必修课。再

加上当时欧洲正处于所谓的“黑暗时期”，拜占庭帝国也是摇摇欲坠，奥斯曼军队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周边国家，奥斯曼骑兵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阻力。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奥斯曼开始的前10位帝国苏丹全都是骁勇善战的“明君”。据说这10位君主一直保持了游牧时期的生活习惯，坚持和手下一道用餐，亲自照料自己的马匹，打仗时也都冲锋在前。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领15万军队，以及300余艘战船，向拜占庭帝国最后的堡垒——伊斯坦布尔发动了攻击。守军仰仗坚固的城墙，硬是坚持了7个星期。为了防止奥斯曼军队动用大炮，拜占庭人预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里安置了沉重的铁链，阻止奥斯曼运送大炮的船只驶进金角湾，但奥斯曼军队愣是用推车连夜将大炮从一侧运上山，再从另一侧下山，直接运到了城墙下。

5月28日，奥斯曼军队发动了总攻，到第二天傍晚，突厥人就完全控制了这座基督教古城，拜占庭最后一个皇帝在城墙上英勇战死。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和基督教的斗争中完全占了上峰，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感到了来自东方的压力。欧洲人的噩梦还没有完，1525年，第10位奥斯曼苏丹登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莱曼大帝。此人在位46年，几乎全都在马背上度过。他亲自率领奥斯曼大军攻陷了贝尔格莱德，征服了匈牙利王国，甚至曾经数次打到了维也纳城墙下，差一点就吞并了整个欧洲。“苏莱曼大帝”这个称号就是欧洲人起的，而奥斯曼人则称其为“立法者”，他的官方称谓后面列出了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的37个王国的名号，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之王。

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

达到了历史最高点。除了整个中东地区和北非之外，南部欧洲和巴尔干半岛也都归苏莱曼大帝管辖，地中海和黑海几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海。作为东西方的地理交汇处，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

但是，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却和一般意义上的帝国很不一样。它既没有统一的语言，也没有统一的宗教，虽然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突厥帝国，但帝国的大多数权贵和官员都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虽然帝国的骑兵队必须由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组成，但帝国的警察和步兵突击队却大都是基督教徒。这个帝国的人民分成了若干完全不同的族群，最出色的水手是希腊人，最精明的商人是亚美尼亚人，最能干的农民来自埃及，最聪明的工匠则是阿拉伯人……帝国采用的是拜占庭的礼仪，展现的是波斯的威严，享有的是埃

及的财富，使用的是阿拉伯的文字。总之一句话，奥斯曼帝国包罗万象，博采众长，是有史以来民族多样性最丰富，以及文化包容度最大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像突厥这样一个尚武的民族，却缔造了如此包容的帝国呢？《奥斯曼帝国闲史》一书的作者杰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认为，除了方便管理等现实因素之外，宗教是最大的原因。奥斯曼统治者认为自己是维护伊斯兰教的“信仰武士”，他们相信救世主很快就将降临，他将纠正各处的不信教者，证明奥斯曼人信仰的正确性，在此之前奥斯曼人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把伊斯兰的旗帜插遍全球，这就是为什么奥斯曼人把帝国疆域之外的地域叫做“战争之土”、帝国之内的土地叫做“和平之城”的原因，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耐心地拓展“和平之城”的疆域，管理好救世主托管给他们的世界。

奇怪的是，曾经的民族大熔炉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极为单一的国家。布尔萨表面上看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路上跑着各种牌子的车，基础设施也很现代，但却几乎见不到任何一家国际连锁品牌店，除了汉堡王和麦当劳之外，也找不到任何一家外国口味的餐馆。大街上除了少数几位挎着相机的游客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位来自非洲或者东亚地区的人。我在市中心逛了一天，只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礼品店，专卖从国内批发过来的小玩具和小礼品。店主是个二十来岁的山东人，一直坐在收银台后面玩电脑，见到我像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亲人，中国话像连珠炮一般蹦了出来："我是来帮姐姐看店的，来土耳其三年了，找不到朋友，土耳其食品也难吃得要吐，如果不是因为生意还不错的话，我明天就想回国。"

据他介绍，因为中国货质优价廉，这个30平方

米左右的小店生意红火得不行，最多的时候要雇8名当地人帮忙看店。他会说简单的土语，但远不到自由交流的程度。布尔萨中国人很少，大家交往也不多，生活极端无聊，他每天唯一的娱乐就是在QQ上和国内朋友聊天。我看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上面有一长串对话框同时在闪，看来这小伙子实在是寂寞得不行了。

作为世界上曾经的两大帝国，中国和土耳其如今面临的很多困境也都是相同的。事实上，如果一定要为人类历史总结出一条规律的话，那一定是“风水轮流转”。当年称霸全球的奥斯曼帝国，挡住了西欧商人通往远东地区的贸易路线，欧洲人被逼无奈，只得冒险乘船向西走，希望能找到一条新的贸易路线，躲开奥斯曼人的控制。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哥伦布“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欧洲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大量财富。再加

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助力，欧洲一举扭转了颓势。与之相反，宽容的奥斯曼人不但没有等来救世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帝国带来的荣耀，就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原来的手下败将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 加里波利保卫战

历史是轮回的。安纳托利亚的历史开始于达达尼尔海峡的入海口，绕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3000年前，海峡的东岸发生了特洛伊之战，3000年后，海峡的西岸又发生了加里波利（Gallipoli）保卫战，正是这场战役决定了现代土耳其的命运。

达达尼尔海峡是欧亚大陆的分水岭，最窄处只有1.4公里宽。这是俄罗斯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水

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同盟国阵营，这就等于掐住了俄罗斯的咽喉。为了将战略物资运抵俄罗斯，协约国决定出兵攻占达达尼尔海峡，打通这条海上生命线。丘吉尔最先派出了海军，希望能在海上解决战斗，没想到顽强的奥斯曼士兵在海峡两岸布下口袋阵，用移动火炮和水雷对抗强大的协约国海军舰队，一共炸沉了三艘战舰，并重创另外三艘。丘吉尔不得不暂停了海上进攻计划，把目光转向了陆地。他计划派遣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占领海峡两岸，而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是狭长的加里波利半岛，协约国的海军陆战队可以直接从地中海出发，在半岛的西侧登陆。一旦登陆成功后，只要翻过山脊，就可以看到达达尼尔海峡。

如今的加里波利半岛几乎全部被保护了起来，成为一个集战争博物馆和自然保护区为一体的旅游

胜地。土耳其当地人喜欢拖家带口开车来此度假，而大部分外国游客则会选择海峡东岸的小镇恰纳卡莱（Canakkale）作为歇脚点。我在这里参加了一个临时组织的旅游团，乘摆渡船越过海峡到达欧洲一侧，然后搭乘一辆小巴车来到了加里波利战场遗址公园。

达达尼尔海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窄，从岸边可以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房子，以及房顶上飘扬的土耳其国旗，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条海峡阻挡了强大的协约国舰队。当我看到协约国军队的登陆地点后，我的疑惑更加强烈了。当年由于夜黑雾浓，运载登陆部队的船靠错了岸，先头部队伤亡惨重。可是，站在原定登陆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实际登陆点，两者只差1公里左右，仿佛抬脚就到了。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小段误差，带来了如此严重的后果。这大概就是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认知差异吧，今

天的科技水平已经比100年前高出太多了，我们习惯了跨海大桥，高速公路，超音速飞行，天堑变通途，我们对距离的认知早已和古人大相径庭，仅凭直觉已经无法理解当年的情境了。

这场登陆战役开始于1915年4月25日，负责登陆的是由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组成的澳新军团（Anzec）。由于登陆地点错误，导致士兵们一上岸就要立即开始爬坡，守军居高临下，本可以轻松地阻止敌军上岸，可奥斯曼军队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误以为敌军会从更北边的地点登陆，把主力部队全部调走了，此处只有少数士兵在把守，这才让澳新军团得以成功登陆，并继续向山顶进攻。

眼看达达尼尔海峡就要失守，一位英雄人物站了出来。奥斯曼帝国的年轻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看出了敌军的意图，他没有听从上级命令，而是亲自率领第57团，在澳新军团之

前抢占了制高点，开始了一场残酷的阻击战。凯末尔对手下士兵们说：“我不是命令你们去作战，而是命令你们去死。当我们全都战死时，其他部队和指挥官就会赶来接替我们。”这个团的士兵果然英勇，子弹打光后就和对方拼刺刀，最后几乎全部战死，却为奥斯曼援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我来到这场阻击战的地点，俯瞰整个半岛，感觉这块地方是那么的小，似乎只要两个钟头就可以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但是就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协约国和奥斯曼军队进行了长达10个月艰苦卓绝的拉锯战。据统计，协约国登陆的48万人当中约有7.1万人战死，死伤人数加起来超过25万；奥斯曼帝国部队也损失了22万人，其中死亡人数高达6.6万。协约国军队眼看无法取胜，只好从加里波利撤军，奥斯曼人获得了最终胜利。

这场战役最著名的地方不是如此高的伤亡率，

而是双方的战斗方式。如今岛上依然保留了大量当时挖的战壕，有些地段双方战壕之间只相隔不到20米！导游告诉我，当时双方士兵在战斗间隙经常互相交换食品和香烟，协约国一方的食品供应出了问题，他们只能啃像石头一样硬的面包充饥，大部分非战斗减员都是因为士兵们的牙坏了，没法吃东西。土耳其人听到此事后就把软面包扔到了对方的战壕里，敌人终于能吃点东西了。

但是，战壕距离近的代价就是战斗异常惨烈，一旦交手，双方都很难活着脱身。有一次双方甚至不得不宣布停战9小时，好让后勤人员上战场收尸，否则的话尸臭的味道实在受不了。因为这个原因，这场战争被历史学家称为“绅士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奥斯曼士兵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当高的。不过，旅行团中的一位新西兰姑娘罗丝（Rose）告诉我，她在土耳其教了两年英文，经常

被土耳其男人骚扰。“他们一般不敢骚扰土耳其女人，但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西方妇女很好欺负，真是很让人讨厌。”她对我说，“我来土耳其之前在宁波教过两年英文，中国学生的学习态度比土耳其人好太多了。土耳其人都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愿意学习英文。”

罗丝的曾祖父曾经参加过加里波利之战，这次她专程前来给老人上坟。土耳其政府在澳新军团的登陆地点修建了好几个公墓，每天都会有人前来献花。不过来此参观的几乎全是游客，很少有土耳其本地人，他们都去了山顶上那个规模更大的战争纪念馆，这是为纪念在此次战役中牺牲的土耳其士兵而修建的，我到的时候发现这里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土耳其人。无数事实证明，无论多么绅士的战争，到最后总是要分出敌我的。

战争纪念馆的入口处竖立着一尊巨大的凯末尔

全身像，他是奥斯曼军队之所以能打赢这场战役的最大功臣。凯末尔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陆军军事学院，是个标准的军人，打起仗来非常勇敢。这场战役中，他一直留在前线指挥作战，曾经四天四夜没有合眼，还曾经被一颗流弹击中了胸部，幸好被他口袋里的一只怀表挡住了，否则的话，土耳其这个国家甚至都不会出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加里波利之战不但是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唯一获胜的战役，也是奥斯曼帝国近百年来打赢的唯一一场战役。作为这场战役的功臣，凯末尔当之无愧地成为整个帝国的民族英雄，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后来他利用自己的声誉，率领土耳其人展开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最终缔造了现代土耳其。他本人也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被土耳其人尊称为“祖国之父”（Ataturk）。

# 从奥斯曼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答案

◎袁越



在蓝色清真寺中祈祷的穆斯林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很好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大部分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这种模式，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00年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最近这1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1911年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古老帝国分别是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它们都是依靠武力实行独裁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前者已经存在了600多年，行将就木，后者虽然只有267年的历史，但也气数已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代替两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是英、法、美、德等西方国家，它们同样依靠武力，占有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并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是新的世界霸主。在西方国家所发明的话语系统里，奥斯曼帝国

和大清帝国这两个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帝国，被统称为东方帝国，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

有意思的是，同为濒死的东方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却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几乎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差一点就从地球上被抹去了，但它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仅存的一小块核心领土上卧薪尝胆，完成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那么，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去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寻找答案吧。

##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如果你在伊斯坦布尔只能参观一个景点，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索菲亚大教堂（Aya Sofya）。这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7年建成的基督教堂，被公认为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最宏伟的教

堂。教堂门口永远排着长队，我在烈日下站了半小时才终于得以进门。可一进门我就明白，这半小时太值了，这是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震撼人心的建筑物，教堂内部宏伟的穹顶，以及墙上精美的镶嵌画，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异常神秘，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再仔细看，我发现教堂前面的牧师讲道台已经被拆掉了，墙上挂着两个用牛皮做成的巨大的圆形奖章，上面用阿拉伯文字写着歌颂真主的词句。原来当年奥斯曼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了这座城市后，便把这座教堂改成了清真寺，虽然墙上的基督镶嵌画被破坏了不少，但教堂本身好歹被保存了下来。穆罕默德心里很清楚，他手下的工匠们是造不出如此宏伟的建筑的。

奥斯曼帝国是由来自中亚的突厥人的后代组成的，突厥人是游牧民族，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

不善于琴棋书画，可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就都必须变得无比好学。清朝的统治者们就是这么做的，而奥斯曼帝国的工匠们很快就学会了建造大型穹顶建筑的精髓，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出了一位世界闻名的建筑师——米马尔·锡南（Mimar Sinan），他将这种圆形穹顶建筑风格发展到了极致。他设计的许雷姆女子浴室和苏莱曼清真寺被认为是16世纪奥斯曼建筑艺术的代表作，非常值得一看。

17世纪初期在位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又更进了一步，他决定建造一座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雄伟的清真寺，以彰显奥斯曼帝国的雄厚实力，这就是位于索菲亚对面的蓝色清真寺（Blue Mosque）。顾名思义，这座清真寺的外表是浅蓝色的，周围有6个高耸入云的尖塔，看上去确实比索菲亚更加宏伟，其内部开了很多窗户，比索菲亚大教堂更加明

亮。蓝色清真寺的设计师是锡南的学生，其设计风格完全模仿苏莱曼清真寺，也采用了圆形穹顶设计，但他显然没有学到拜占庭工匠的核心技术，大厅内不得不加了4个“象腿”作为支撑，空间被大大压缩。相比之下，索菲亚大教堂的支撑腿被巧妙地包进了墙壁之中，视觉效果比蓝色清真寺好太多了。



土耳其地图

蓝色清真寺可以说是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辉煌，自它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便开始走下坡路，再也没有缓过来。前文说过，奥斯曼帝国的前10位苏丹都是骁勇善战的明君，但是苏莱曼大帝之后的几位苏丹却都昏庸无能，有几个甚至还是弱智，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丹王位的继承规则发生了变化。原来，奥斯曼苏丹并不遵循长子继承制，而是谁有能力谁来做，于是早期苏丹大都在军队或者地方上经受过实际的考验，能力超强。为了防止王子们争权，新苏丹必须将自己的兄弟们统统杀死。比如，接替苏莱曼大帝的穆罕默德三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杀死了自己的19位兄弟，奥斯曼帝国就是以这样一种残忍的方式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但是，穆罕默德三世去世后只留下两位少不更

事的儿子。为了确保香火传递，新苏丹网开一面，没有杀死自己的弟弟，而是将其软禁在宫中。从此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替制度就发生了改变，新苏丹不再杀死自己的兄弟们，而是将他们全部软禁起来。这一改变的结果导致奥斯曼帝国未来的苏丹们大都是来自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纨绔子弟，整体素质一落千丈。比如，过去的苏丹们一直保持着战争时期的传统，和手下人一起吃饭，自己整理自己的马匹等等，可17世纪之后的苏丹把与手下人分享食物的传统改为两年才进行一次的仪式，意义完全变了。

苏丹们居住的地方叫做托普卡帕宫（Topkapi Palace），也是伊斯坦布尔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这座宫殿的格局很像北京故宫，由好几个套在一起的庭院组成。所有的建筑物都很矮，远不如近在咫尺的索菲亚大教堂。苏丹所住的后宫在最里面，外

人想见他就得跨过好几道大门，苏丹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保持了自己的私密性，并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欧洲人对奥斯曼后宫一直非常好奇，很多文艺作品都是以托普卡帕宫为背景写成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后宫诱拐》。

如今这座宫殿每天都挤满了游客，再也不神秘了。平心而论，苏丹和妃子们的寝宫一点也不奢华，甚至可以说有点寒酸。大部分卧室都很小，家具普遍简陋，墙上也没挂名画什么的，只有繁复的伊斯兰风格壁画。导游解释说，托普卡帕宫是按照战时军营的样子建造的，奥斯曼帝王都是军人，不习惯奢华。不过，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一来当时的生活条件确实和现在没法比，如今普通人都能享有的抽水马桶和席梦思等等就连苏丹们都没有，难怪大家会觉得寝宫有些寒酸；二来苏丹本人收藏的大部分奢侈品都被转移到了专门的博物馆保藏，托普

卡帕宫拿出其中一部分办了个展览，来自世界各地的嵌满宝石的黄金饰品让人眼花缭乱。

托普卡帕宫极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低调的奢华”。

事实上，真正的奢华并不体现在珠宝首饰等硬件上，而是对人的奴役。奥斯曼苏丹从世界各地收罗漂亮的小女孩，将她们收入宫中加以培养，长大后选择其中优秀的做嫔妃。托普卡帕宫的后宫最多时同时住了600多名妇女，其中10%为苏丹的嫔妃，其余的全是侍女。宫中还住着很多太监，但他们清一色都是从埃塞俄比亚抓来的黑人奴隶。原来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不得为奴，基督教和犹太教徒因为信奉同一个真主（即上帝），也不能为奴，于是只能从非洲抓来不信真主的“野蛮人”作为奴隶。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所谓“低调的奢华”其

实还有虚伪的成分在里面。

上梁不正下梁歪。奢华而又昏庸的宫廷政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堕落。奥斯曼官场花钱买官风气日盛，导致各级官僚贪赃枉法的情况日趋严重，老百姓怨声载道。类似的情况几乎在任何一个封建帝制国家里都会发生，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衰落之前的奥斯曼什么样？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援引16世纪晚期的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比斯贝克的话说：“一想到这两种不同的体系一定会造成的后果，我就不寒而栗……在他们那一边，（奥斯曼）帝国财力充盈，资源强大，军队实战经验丰富，士兵身经百战，连续打了一系列胜仗，随时准备忍受困苦，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勤俭节约，警惕性高。在我们这边，国库亏空，生活习惯奢靡，资源耗竭，士气不振，士兵缺乏经验，难以驯服，好

斗，毫无组织纪律可言，行为放纵毫无约束，酗酒，纵情声色，而最糟糕的是，我们的敌人往往战无不胜，而我们却总是打败仗。两军相遇其结局如何，我们还用怀疑吗？”

比斯贝克描述的是奥斯曼帝国和它最厉害的对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那是1583年，奥斯曼帝国再次出兵维也纳，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维也纳守军侥幸获胜。这场战斗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达数世纪的战争的转折点，也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时刻。38年之后，也就是1621年，英国爵士托马斯·洛访问伊斯坦布尔，回来后写下了他眼中的奥斯曼帝国：“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

可是，就像很多古老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虽然内部危机重重，但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是不那

么容易崩溃的。奥斯曼帝国比这位英国爵士多活了300多年，甚至比它最凶猛的对手——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还多活了4年，这是为什么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去土耳其军事博物馆走一趟。

## 坦齐马特时代

土耳其军事博物馆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下午都会举办一场露天表演，演员们身穿奥斯曼士兵的传统服装，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表演正步走和兵器操练，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看完表演走进博物馆，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突厥士兵攻打长城的景象。这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观察这场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战争，感觉有些怪异。再往里走，一张张巨幅

油画描述了突厥人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战场也逐渐从东亚转移到了欧洲。一张油画的解说词里这样写道：农耕民族遇到天灾时总是束手无策，而游牧民族在饥荒时就会远走他乡，不知不觉地朝着日落的方向走去。“走”是一种谦虚的说法，真正的含义就是侵略。战争是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突厥没有“军人”这一职位，打仗是所有突厥男人必须学会的看家本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只要能继续打胜仗，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事实上，在整个17世纪，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国力渐衰，西欧诸国在启蒙运动的引导下大踏步迈向现代化，但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仍然所向披靡，苏丹们沉醉在战争的胜利之中，听不进任何建议和忠告。奥斯曼人也沉浸在虚妄的自大中不能自拔，他们给周边国家的人民起了各种侮辱性的绰号，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下水的人，格鲁吉亚人为好吃懒做

的人，希腊岛民都是傻瓜，西班牙人都是懒汉，意大利人都是杂种，德国和俄罗斯人是疯狂的异教徒，犹太人是污秽的狗，法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人，英国人是无神论者。




1570年时奥斯曼帝国地图，整个中东地区、北非，以及巴尔干半岛都成了奥斯曼苏丹的属地，而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黑海都几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内海

正是这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敲响了奥斯曼帝国的丧钟。1687年，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三年后，他的朋友

约翰·洛克出版了《政府论》。这两本书让西欧人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引发了科学革命和人权运动，拉开了工业化时代和民主时代的序幕，奥斯曼帝国远离了这场大革命，被历史的洪流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随着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决定效仿英法两国实行改革，引进先进武器和管理方式，胜负的天平开始逐渐向这个奥斯曼帝国北方最大的敌人倾斜。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一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一开始奥斯曼帝国还能轻松应对，但1768年进行的第三次奥俄之战以奥斯曼帝国的惨败而告终，奥斯曼苏丹不得不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卡伊纳雅条约》，把帝国境内的东正教教徒的保护权交给了俄罗斯。从此，俄罗斯就可以打着保护教民的旗号，合法地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苏丹塞利姆三世即位仪式（绘于18世纪）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不仅是打输了一场战争，而且输的方式太屈辱了。俄罗斯军队威力强大的火器让奥斯曼骑兵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毫无取胜的可能。目睹了整个过程的奥斯曼将军们终

于明白，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奥斯曼帝国再也别想打赢任何一场战争了。对于一个完全建立在军功上的帝国而言，这是最大的噩耗。

战争是一件价值观非常明确的事件，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没有中间地带，没法投机取巧。奥斯曼苏丹们可以对帝国经济的衰落、官场的腐败、文化的疲软和老百姓的怨声载道统统视而不见，但打败仗这件事是没办法装聋作哑的，必须立即想办法解决。清王朝如此，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去过西方国家的帝国精英们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是没法和强大的西方相抗衡的，只有放下架子，向西方文明学习这一条路可走。正是在这批人的鼓动下，奥斯曼帝国终于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8世纪初期，一批有机会游历西方国家的使臣和学者们已经开始把西方文明传进了

伊斯坦布尔。苏丹们尤其对西方的绘画、音乐和建筑艺术感兴趣，来自法国的画师、建筑师和家具设计师纷纷被苏丹请进宫中，为苏丹及其妃子们画像，安装烛台和枝形吊灯，竭尽全力模仿法国宫廷的生活方式。清帝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故宫内的珍宝馆就是明证。

苏丹们的这些行为虽然谈不上是真正的改革，但它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变革大都开始于文化层面潜移默化的渗透，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作为铺垫，后来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了。


奥斯曼苏丹的新皇宫——多玛巴切宫豪华卧室

奥斯曼宫廷从西方引进的诸多奇技淫巧中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那就是印刷术。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奥斯曼帝国一直拒绝引入印刷术，直到18世纪初期才网开一面。虽然最初只允许印刷宗教书籍，但这个禁令很快就被打破了，为新思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789年，年仅27岁的苏丹塞利姆三世即位。这是一个年轻有为、极富野心的帝王，他意识到如果再不改革的话，奥斯曼帝国就要灭亡了。他决定先从军队入手，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取代帝国的近卫兵团。西方诸国当中他最崇拜法国，当他还是王储的时候就和法王路易十六有交往，因此他专门从法国购买了一批来复枪和西式火炮，又请来法国军事顾问负责训练新军。为了配合法国教官们的工作，他还专门设立了几所军事院校，用法文授课，每所学校都新建一个图书馆，收藏的也大都是法文书籍。

但是，新式武器很容易买到，使用武器的人才却不那么容易培养。一位英国商人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观察笔记，根据这本书上的描述，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普遍缺乏科学素养，除少数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炮、建造船只之

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这种狭隘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对外面的世界毫无兴趣。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但是年轻气盛的塞利姆三世没有处理好和大臣们的关系，颁布了很多过激的政策，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一批旧式军官发动了政变，杀死了塞利姆三世，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次改革就这样失败了。

塞利姆三世死后，奥斯曼王室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位男性继承人马哈茂德二世被推上了王位。他是塞利姆三世的堂弟，两人关系非常好。他不但从堂哥那里继承了改革的遗志，而且还吸取了血的教训，那就是改革必须有耐心，先要想办法强化苏丹的权力，然后利用权力清除反对势力，才能获得成

功。

为了达到目的，马哈茂德二世刚上台那几年表现得非常低调，但他在暗中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卧薪尝胆18年后，也就是1826年，马哈茂德二世突然颁布诏书，废除了帝国近卫兵团，组建了一支新军保卫王室。此举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为改革扫清了障碍。此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完成了从过去的封建军事联合体制向中央集权体制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含义非常深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昝涛认为，这次改革标志着奥斯曼统治精英们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强大从表面上看源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实质上这种进步背后的动力来自其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要想与西方对抗，就必须同时在政治组织形式上对帝国进行改革。而马哈茂德二世所进行的第一次政治改革尝

试，其宗旨就是效仿西方的绝对主义国家模式，力图通过吸纳与统一臣属于奥斯曼人的各民族，创造出一个奥斯曼民族，将帝国内部的各种势力整合到一起。而整合的具体方式就是先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把权力集中到苏丹手里，然后由苏丹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进入了“奥斯曼主义”时代。

历史证明，马哈茂德二世实行的政治改革措施大都收效甚微，但有两件事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他改革了帝国的教育制度，创办了外文编译局和西欧式的世俗学校；其次，他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向西方派出大批公费留学生，虽然其中大部分都进了西方的军校，但此举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人才。

1839年，踌躇满志的马哈茂德二世不幸因病

去世，继承皇位的太子阿卜杜尔·麦吉德苏丹当时才16岁，需要母亲和大臣们的辅佐。于是，新受命的大臣们拟定了一份《花厅御诏》，为帝国制定了一套新的方针政策，土耳其历史上著名的“坦齐马特”（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改革”）时代正式开始了。

《花厅御诏》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确立了基本原则，其主旨就是向西方学习，模仿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但这份诏书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概念：“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不分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别小看这句话，这就等于宣布奥斯曼帝国将和传统的伊斯兰教彻底决裂，奥斯曼主义将取代伊斯兰教义，成为帝国新的国策。

坦齐马特时代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奥斯曼帝国对内一直实行米勒（Millet）制度，即给予不同宗

教信仰的人群以相当大的自主权。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加方便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但坏处就是各个民族一直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爆发独立运动。事实上，由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的鼓动，帝国内部的东正教徒、犹太教徒和格里高利派等几大非穆斯林米勒早已酝酿从帝国独立出来，如果成功的话，帝国就要解体了。奥斯曼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肢解帝国，希望各民族团结在奥斯曼的大旗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大的西方。帝国的精英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伊斯兰教的主导地位。

为了向西方人证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合法的独立国家，帝国的精英们于1876年颁布了奥斯曼帝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帝国将是一个“有限的独裁政府”，内阁只对苏丹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这部宪法遭到了来自伊斯兰保守势

力的阻挠，苏丹哈米德二世屈服了，于1877年2月宣布搁置宪法，强迫议会休会，坦齐马特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去多玛巴切宫看一下就明白了。



终止了坦齐马特运动的苏丹哈米德二世

# 青年土耳其党

多玛巴切宫（Dolmabahce Palace）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和老皇宫托普卡帕宫隔着一个金角湾。这是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为自己修建的新行宫，花了11年才建成。为了显示“西化”的成果，他命令建筑师以法国的凡尔赛宫为蓝本，建造一座完全不同于“寒酸”的托普卡帕宫的新皇宫。多玛巴切宫一共有285个房间，自1856年建成后，这里就成了奥斯曼帝国最后6位苏丹的住所。


在巴尔干战争中作战的士兵

如今的多玛巴切宫变成了一座博物馆，但因为内部空间狭小，贵重物品太多，散客是不允许进入的，必须在导游带领下才能一睹芳容。从外表看，多玛巴切宫由几幢独立的小楼组成，看上去像是普通的办公楼，外墙装饰相当简陋，和它的地位很不

相称，但其内部装饰之豪华简直令人咋舌，完全可以和任何一幢西欧王室宫殿相媲美。

因为怕地震，整幢建筑均采用木质结构，所有的楼梯扶手和支柱的表面都是精雕细刻，屋顶上画满了欧式风格的装饰画，墙上则挂满了西洋油画，但画的内容大都是歌颂帝国苏丹的丰功伟业。为了保证新皇宫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奥斯曼人专门请意大利工匠来装饰屋顶，请法国的设计师设计地毯和家具，从英国进口了一座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灯，重达4.5吨，因为它实在太大了，必须先把各个部件拆下来后单独分装，运到伊斯坦布尔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如果你认为如此奢华的建筑一定是在国泰民安的时候造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马哈茂德二世统治时期的奥斯曼帝国恰好是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因为赋税过重，导致农业发展停滞不前，公路、铁

路和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再加上欧洲列强逼迫帝国签署的通商条约把关税定在了8%的低位，导致帝国的工商业失去了保护，被进口商品打得七零八落。

也就是说，当帝国的精英分子们热衷于推行西化改革的时候，恰逢奥斯曼帝国的农民、工人和小商小贩们都穷得吃不饱饭，再加上帝国为了推行奥斯曼主义，一直在弱化伊斯兰教的地位，遭到了广大教徒的反对。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坦齐马特运动的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终止了坦齐马特运动的苏丹哈米德二世并不反对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是在他担任苏丹期间颁布的，但他从前任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意识到奥斯曼主义是行不通的，必须依靠伊斯兰教的势力，借助宗教的力量团结广大穆斯林，联合起来对抗来自欧洲的异教徒。于是，哈米

德二世放弃了“奥斯曼主义”，转向了“泛伊斯兰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转变是有些奇怪的，因为奥斯曼统治者从来没有在国内张扬伊斯兰意识，奥斯曼历史上居然只有一位苏丹去麦加朝圣过。但是当历史发展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伊斯兰教岌岌可危。奥斯曼帝国虽然已经没落，但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担当起复兴伊斯兰教的重任，于是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伊斯坦布尔。

昝涛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那就是帝国民众对坦齐马特改革的反弹。具体来说，当异教徒们利用强权抢走了本属于奥斯曼人的领土，而坦齐马特时代的改革运动却流于对西方的拙劣模仿，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效时，很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即“用贬低所憎恨的对手所重视的价值观来表示不满”。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哈米德二世开始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他向世界各地派出使者，要求伊斯兰国家承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身份。1901年，哈米德二世派出的宗教代表团访问了新疆，代表苏丹慰问了这些地方的穆斯林。后来他还试图与清政府联系，希望在中国境内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该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问题在于，这些推广措施要想取得成功，前提是奥斯曼帝国一定要成为一个在各方面都强大的国家，但奥斯曼帝国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改革，却收效甚微，苏丹们并没有意识到，光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或者简单地拷贝西方的政治体制，是无法成功的。另外，这一时期的改革派的出发点不是富国，而是强兵，改革派没有从长远着想，而是仅仅想办法渡过眼前的危机，一旦危机过去，比如敌军停止了进攻，改革的动力就没有了，保守派就会重

新占得上风。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杰森·古德温撰写的《奥斯曼帝国闲史》记载，被请来训练帝国新军的普鲁士少校赫尔穆特·冯·穆尔特科（Helmuth von Moltke）曾经这样评价奥斯曼帝国：破除古老的体制是一回事，建立一个能够取而代之，并被所有阶层都接受的新体制却是另外一回事。土耳其人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在科学、技术、财富、胆量和实力方面，欧洲人都比自己强，但他们也因此从来不认为欧洲人会愿意和穆斯林平起平坐。一句话，普通土耳其人并不打心眼里尊重欧洲人，而只是打算从欧洲人那里学到技能，然后再打败对方。

眼看帝国行将就木，一批曾经留学海外的精英分子们看不下去了。1889年，4名伊斯坦布尔医科学生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在伊斯坦布尔秘密集会，成立了“奥斯曼团结协会”，号召推翻

独裁政府，恢复宪法。他们很快就和海外流亡的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并将总部迁到了巴黎，创办了《青年土耳其》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同一时期，类似的组织在海内外遍地开花，参加者大都为体制内的精英知识分子，甚至有很多帝国军官参加了进来，历史学家把这批立志推翻独裁体制的革命者统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当年被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派出去的公费留学生。

1907年，青年土耳其运动的成员在巴黎召开大会，把分散在各地的各种组织加以合并，成立了“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第二年，青年党人发动政变，迫使哈米德二世恢复宪法。政变成功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后，伊斯坦布尔沸腾了，大街小巷一夜之间贴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口号，大家纷纷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仿佛一个现代化的奥斯曼帝国即将诞生。

但是，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人们的幻想。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执政之后立即发生了分裂，自由派主张分权，给不同民族和教派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力；民族派则提倡中央集权，希望由奥斯曼人来控制一切，恢复奥斯曼帝国往日的荣耀。一开始是自由派占上风，但民族派利用了人们的爱国心理，很快夺回了话语权，帝国重新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非穆斯林居民，甚至非奥斯曼人的穆斯林居民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帝国仅仅享受了几天的民主自由，就又回到了原点。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战争爆发了。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为首的巴尔干半岛居民受够了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在西方列强的暗中帮助下揭竿而起，和奥斯曼帝国军队展开了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巴尔干战争先后进行过两次，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总的结果就是奥斯曼帝国损失了大片国

土。如果说输给西方列强还可以接受的话，输给原来的手下败将让奥斯曼人感到无比屈辱，不少人终于意识到必须彻底实行改革，否则这个国家就要完蛋了。战后一家土耳其报纸意味深长地写道：我们的失败意味着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后胜利。

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促使各方势力重新进行组合，使得巴尔干地区的局势愈发复杂化，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和德国结盟，加入了同盟国组织。为了重振伊斯兰教，奥斯曼苏丹宣布对协约国实行“圣战”，结果证明奥斯曼人押错了宝，帝国军队装备陈旧、士气低落，无论是强大的德意志军队还是神圣的伊斯兰教义都救不了它，这场战争以协约国获胜而告终。这场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的突厥臣民们意识到，无论是帝国还是伊斯兰教都靠不住，今后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值得一提的是，帝国军队在“一战”中只打了一场胜仗，那就是加里波利保卫战，那场战役的指挥官凯末尔被奥斯曼人视为民族英雄，获得了“伊斯坦布尔大救星”的美称。

“一战”结束后不久，西方列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法国出兵占领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英军攻占了叙利亚；意大利控制了地中海西部；希腊抢占了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重镇伊兹密尔，伺机向安纳托利亚内陆进攻；亚美尼亚则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地区。

1920年，奥斯曼苏丹被迫签署了屈辱的《色佛尔条约》，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只留下了安纳托利亚中间的一小块黄土高原。历史学家们认为，奥斯曼帝国早就是西方列强案板上的一块肉了，如果不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好怎么分这块肉，因

此互相牵制的话，这一天早就应该到来了。

但是，列强们低估了奥斯曼人多年征战养成的民族性格，以及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帝国的将士们早已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就缺一位带头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位领袖，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 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凯末尔纪念陵墓坐落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郊区的一座小山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进入陵墓之前先要走过一条长长的步道，不断有扛着步枪的士兵迈着正步往来巡逻，擦得锃亮的皮靴踏在青砖之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陵墓本身的设计很简单，中间是一个广场，两侧各有一幢米黄色建筑物，屋内安放着凯末尔的石棺，以及几块简单的石碑。真正值得一看的东西都在地下展厅，展出的军装、武器、油画和实景装置把凯末尔的一生浓缩给大家看。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定义这位土耳其之父的话，那一定是“军人”。凯末尔所取得的一切成

就，都和他的军人身份密切相关。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在马其顿南部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木材商人，可惜在他7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凯末尔服从了母亲的意愿，上了一所宗教小学，因为淘气被教务长打了一顿，因此他从小就对宗教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他后来曾经回忆说：“我断然拒绝相信，在今天，在科学、知识、文明都全方位闪亮登场的今天，在文明的土耳其社会里，还会存在这样的人，仍然在这个或那个教长的指导下，愚蠢地寻找他们所谓的物质和精神的幸福。”

凯末尔从小就对打仗感兴趣，梦想成为东方的拿破仑。小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军校，18岁时又考进了伊斯坦布尔陆军军事学院，这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学校，被称为是培养禁卫军的摇篮。凯末尔虽然学习非常用功，但他不服管教，经常阅读禁

书，还热衷于去伊斯坦布尔的新城区喝酒嫖妓，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土耳其运动开始后，已在军中服役的凯末尔也创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参与了这场改革运动。但他一开始并不属于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层，加里波利保卫战让他一战成名，在老百姓和军人当中获得了极高的威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末尔对帝国政权极度失望，但他仍然对政府抱有幻想，谋求改良而不是革命。青年土耳其党倒台后，他曾经想建立新的内阁，并由他本人出任战争部长，但不擅官场的他受到伊斯坦布尔政客的冷落和排挤，失意的凯末尔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伊斯坦布尔，来到黑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萨姆松，并脱去军装，以平民的身份组织了一支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独立救国运动。当时恰逢希腊军队入侵安纳托利亚，凯末尔率领革命军和希腊人展开了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生死战役，大获

全胜。此后凯末尔又乘胜出击，收复了一部分被占领的领土，最终在1923年成功地迫使西方列强签署了一份新的《洛桑和约》，现代土耳其的边界终于被固定了下来。

如果和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相比，土耳其的新边界简直太憋屈了，只保留了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主体部分，以及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一小块欧洲土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么做就等于把奥斯曼帝国建国后依靠武力而获得的土地全部退了回去，只留下了突厥人最初移民到中东地区时的根据地。奥斯曼帝国在尝试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后，终于明白两条道路都走不通，必须忍痛割爱，走民族主义这条路，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与通常认为的相反，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民族国家”是在最近几百年才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现代现象。最早的民族国家出现在欧

洲，18世纪英法的崛起，就是从建立民族国家开始的。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把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原生型民族主义”的代表是近代的英格兰，“民族主义运动”最早就是在英格兰开始的，其目的在于把国家主权从王室和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这个过程，人民被提升到了“政治精英”的地位，他们必然要求实现“主权在民”的民主体制，民族的概念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但对于像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国家来说，他们实行的是“输入型民族主义”，即先从外面输入了“人民主权”这个新概念，然后再引发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变。后一种民族主义是被动的，不“自然”的，难免产生一系列副作用。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意识最早是在知识分子精英圈流行起来的，他们这么做是想效仿西方，把奥斯曼帝国改造成一个以土耳其人为主的民族国家。但

是奥斯曼帝国原本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帝国，突厥人在西进过程中和沿途遇到的不同部落相互融合，其传统早已消失了，“土耳其人”（Turk）甚至已经演变成了“乡下人”的同义词。一位小说家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农民对前来考察土耳其民俗的知识分子说道：“但是，先生，我们不是土耳其人，我们是穆斯林，感谢真主，您说的土耳其人住在Haymana那边。”

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突厥传统，奥斯曼帝国的精英们不得不从西方的人类学研究中寻找灵感，并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构历史，迅速地制造了一个土耳其传统。出生于中国昆明的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这种生造出来的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意思是说，“民族”这个概念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是现代政治家们按自己的需要

而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民族”这个概念一旦被编造出来，就传播得非常快，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认同，人类对于相互认同的感情需要是非常强烈的，而凯末尔打出的民族主义这张牌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为了实现民族主义理想，将土耳其建成一个纯粹的民族国家，凯末尔不惜动用武力强行驱散原本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异族人，并欢迎住在国外的土耳其人回国定居。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场人口大迁徙，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希腊人被迫离开家乡，而原本住在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农民大批返回土耳其定居，这一交换“纯化”了土耳其的民族成分，却降低了国民素质。对于居住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凯末尔则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甚至禁止他们使用自己的语言，此举遭到了库尔德人的强烈反弹，他们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抗争，

库尔德问题成了土耳其的一块心病。

凯末尔坚信伊斯兰教是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绊脚石，一心想将其铲除。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王权（苏丹）和教权（哈里发）由一人担当。凯末尔决定先从王权入手。1922年11月16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苏丹制，并以叛国罪把苏丹及其主要大臣交由最高法庭审判，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听到消息后连夜出逃，延续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制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年，凯末尔宣布成立共和人民党，并自任主席。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经过投票后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定都安卡拉，并任命凯末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这两件事都有不少反对者，但投票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大量弃权票，但没有一人敢投反对票。

至此，凯末尔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凯末尔的

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借此机会营私舞弊，而是继续祭出重拳，在社会和民生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举措在今天看来都过于激进，如果凯末尔没有掌握绝对权力的话，这些改革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水烟吧

即使握有如此重大权力，凯末尔对于伊斯兰教本身的改革仍然非常谨慎。他先是成立了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宗教事务局，局长作为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可以解释伊斯兰教法，但作为政府官员，他在采取重大决定之前又必须和自己的世俗上司商量，这就等于剥夺了哈里发的实际权力。但在1924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伊斯兰教仍被定为“国家宗教”，直到4年后修改宪法，才把这句话删掉。从此，起码在法律上，土耳其终于变成了一个世俗国家。1937年，土耳其再次修宪，确立了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命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这“六大主义”为土耳其立国纲领的六项基本原则。历史后来的发展轨迹证明，这六大主义当中最核心，也是后来遭到挑战最多的正是世俗主义。

从某种角度来看，凯末尔所进行的改革可以被

称为是一场以独裁的方式推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土耳其要想变得强大，除了西方化和世俗化之外没有其他途径可走，而这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对土耳其的文化传统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不首先改变土耳其的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铲除土耳其文化中的劣根性和伊斯兰教对思想的禁锢，其他一切都是妄谈，包括民主在内。

凯末尔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却是第一个有能力这么做的。他在这场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一点也不比过去的几任立志改革的苏丹小，但他的前任们都没有他这样的威望和权力。作为土耳其的开国元勋，他有充分的条件成为一名独裁者，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条件，强迫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完成了一次艰难的转身，这一点和哥斯达黎加的开国元勋费雷尔很相似。

# 尾声

《奥斯曼帝国闲史》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奥斯曼人喜欢狗，因为狗能吃掉垃圾，保持城市的干净，狗粪则被制革工铲走，用做鞣革的原料。19世纪末期，伊斯坦布尔有15万条狗，平均每8个人一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野狗。但是这些野狗有碍市容，它们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把伊斯坦布尔建成一个现代化城市，于是奥斯曼苏丹派人将这些狗统统抓了起来，运到了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可没过几天，它们又都从大海里游了回来，伊斯坦布尔迅速恢复到了几天前的样子。如此这般重复了数次，结果都是一样。“一战”结束后，打了败仗的苏丹这才痛下决心，命人将这些野狗运到一个远离城市、无人无水的荒岛上，这一次，狗们

再也没有回来。

可惜的是，这位苏丹觉悟得太晚了。

# 这个国家的细部与细节

◎袁越



布尔萨清真寺里的小男孩

哥贝克力石阵的发现，说明土耳其南部很有可能是人类宗教的起源地，甚至有可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地。如今这块地方变成了土耳其的工农业生产基地，人类文明正逐渐越过宗教这个坎，向着更高级的地方前进。



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浴室


哥贝克力石阵全景

## 哥贝克力石阵

尚勒乌尔法（Sanliurfa）是位于土耳其南部的一座旅游城市，在土耳其语里的意思就是“先知之城”，因为先知亚伯拉罕据说就出生于此。这里靠近叙利亚边境，看上去更像是一座阿拉伯城市，大

街上经常能见到穿着拖地长袍，把脸全部蒙住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妇女匆匆走过。据导游说，这座城市是东西和南北两条古代贸易路线的交叉口，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历史上战争不断，市中心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古城堡，可惜因为城堡损伤得太厉害，谁也看不出它到底建于何时。

尚勒乌尔法北边有一片丘陵地，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其中海拔最高的大腹山（Gobekli Tepe）。今年4月的一天，我从市中心出发，沿着高速公路向东北方向开，路两边全是农田，种的大都是小麦。因为气候干旱，当地政府修建了多条水渠，我见到的最宽的一条竟然有10米多宽，简直就是一条运河，看得出土耳其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在农业基础建设上下过大工夫。事实上，土耳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完全不需要进口农产品的国家，这一点连向来自诩为农业大

国的中国都做不到。

土耳其人口密度不算低，气候条件也不算好，做到这一点难度很大。缺水还是次要的，更大的困难是土壤的肥力不足。原来，这块地方属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北端，是农业的发源地。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已经被人类耕种了上万年，土壤养分流失严重。

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地球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气候逐渐变暖，植物恢复了生机。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形如倒扣弯月的区域（即新月沃地，也就是如今的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南部）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农业带来的稳定产量使得住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放弃了游牧和采摘的生活方式，定居了下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定居点不断扩大，出现了村庄和集市，人们在交往和合作中划分了等级，开启了心

智，出现了艺术和宗教，人类文明就这样诞生了。

那么，农业为什么只在新月沃地出现了呢？美国著名历史学者杰瑞特·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指出，因为气候和地理位置等原因，新月沃地恰好存在一批适合耕种的植物品种，纯属运气好。他认为，农业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不可能是某人灵光一现想出来的，而只能是大自然呈现给人类的礼物。考古学家曾经在距离大腹山东北方向不到100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最接近现代单粒小麦（Einkorn）的野生小麦，单粒小麦是小麦的一个突变种，不但可以自花授粉，而且种子成熟后不会从麦穗上脱落。前一个特性便于育种，后一个特性便于收割，这两条是农业之所以能够诞生的关键所在，缺一不可。

以上就是历史学家关于文明起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大腹山下挖出来的一处史前文明遗址彻底颠

覆了这个理论。大腹山很好找，我按照路标的指示顺利地开到大腹山脚下，这是一座被农田包围着的小山，比四周的平原高出将近100米。让我惊讶的是，如此重要的遗址竟然没有围墙，也不收门票，只有一对父子负责看守。他俩本是附近的农民，当年被考古学家雇来挖土，参与了整个挖掘过程。后来两人自学成才，看大门的同时兼任导游。

我顺着一条盘山小路往山上走，沿途看到一块石头上有很多小圆孔。导游解释说，这是古人处理石头的一种方法，即先用简单的石器在石板上凿出一排圆孔，然后再将其敲断，有点类似于撕邮票。

走到山顶，眼前出现一个大坑，里面有4个大小不等的圆形建筑物，大的直径有20多米，小的也有近10米。建筑物四周用砖头垒成，中间竖立着若干T形石碑，最高的一块有5.5米高，重达16吨。石碑上刻着很多动物浮雕，出现最多的是狐狸、蝎

子、野猪和蛇等能够伤人的凶猛动物的形象。可惜不少石碑都被考古人员用木板包了起来，导游也不让游客下到坑中，看得不够真切。

据导游介绍，这座山自古以来一直被当地人视为神山，传说这里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猜测山下埋着东西，结果挖出来一些燧石做成的石碑残片，但他们以为这是拜占庭时期的墓地，而类似的遗址在土耳其遍地都是，不稀奇，便放弃了。1994年，德国海德堡大学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来此考察，意识到这是一处比拜占庭更为古老的遗址。他申请到一笔钱开始挖掘，终于挖出了这些奇怪的石碑。如今考古界按照大腹山的土耳其名字，称其为“哥贝克力石阵”。

从石碑的形状和动物浮雕来判断，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教祭祀场所，石碑上刻的动物要么是原始人

的精神图腾，要么是原始人请求它们不要伤人。T形石碑则很可能是站立的人形，代表了某种宗教仪式的图腾形象。同位素年代鉴定显示，最早的建筑建于公元前9600年，比此前已知最早的人类寺庙还要早5000多年，甚至比农业的出现还要早。最晚的则建于公元前8200年，此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建筑了，仿佛这批建造者突然放弃了这块地方，再也没有回来。

石碑所用的石材来自距离此地800多米远的一处采石场，当年显然没有任何运输工具，就连轮子、金属和玻璃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这些巨石大概是用圆木滚动的方式运到山上的。施密特估计建造这些寺庙至少需要几百名工人同时工作，这说明建造者已经懂得了分工合作，其文明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问题是，这些人靠什么为生呢？施密特将大腹

山的周围仔细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人工种植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工人居住的房屋遗址，但他发现了大量吃剩下的羚羊和野牛骨头，说明工人们所吃的食物是由同伴们从远方专门运过来的。这些人平时并不住在这里，而是被临时召集起来，修建了这座寺庙。

地磁勘测显示，这座山的下面一共有20个这样的寺庙，目前出土的遗迹仅占总面积的1/10都不到，还有更多的秘密有待发掘。但是，根据目前已有的发现，施密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这座建筑物是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进行宗教仪式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认为在农业出现之前，仅靠打猎和采摘过活的原始人类完全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宗教，并发展出自己的文明。

施密特甚至认为，正是在建造寺庙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工人们的食品供应，人们开始采集野生谷

物并加以耕种，培育出了最初的小麦品种，农业随之诞生。如果这一说法最终被证实的话，人类文明的进化史就要被改写了。文明不一定是农业的产物，很有可能是反过来的。

“20年前，大家都认为文明是在大自然的推动之下产生的。”施密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可我觉得，我们正逐渐意识到，文明其实是人类心智的产物。”

那么，经过一万多年的进化，人类的心智是否有所进步呢？

## 农场主和他的亲戚们

离开大腹山，我沿着90号高速公路向西进发。一个多小时后，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这就是幼发拉底河，你一定听说过吧，我们就在河边找个饭

馆吃午饭吧。”司机穆拉德（Murad）对我说。他今年40多岁，是一位艺术家，业余时间喜欢研究土耳其历史，自称是凯末尔主义的信徒。这次他专程开车带我来土耳其南部考察，一路上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土耳其的事情，并毫不隐晦地对现任政府的很多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个政府背叛了阿塔图克（即凯末尔，土耳其国父）当年的教导，土耳其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农场主卡迪尔夫妇在自家的无花果园前

我们站在河边朝对岸望去。这段河道并不宽，水流极为缓慢，河面上看不到一条船，安静得像一面镜子，河对岸密密麻麻的房屋倒映在河水中，仿佛时间都静止了。我从小学就知道，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道孕育了新月沃地这片文明的沃土，滋养了下游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两条河均发源

于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水流量随季节变化很大，不利于航行，但落差大，适合发电。穆拉德告诉我，这条河的上游已经修建了六七个水坝，形成了好几个堰塞湖。土耳其政府还计划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在支流上再建造1200座小水电，因为土耳其近几年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能源极度短缺。

我们在河边找了家小饭馆坐下来吃午饭。土耳其食品种类非常丰富，肉和酸奶都是必有的，大饼绝对管够，蔬菜则喜欢生吃，绿油油的嫩菜叶和辣椒不蘸酱，直接送嘴里嚼。

“现在这个政府太不重视教育了，据说目前只有250万土耳其人经常阅读报纸，平均每10个土耳其人每年阅读一本书，也就是说，每人每年只读0.1本！”穆拉德一边嚼着生辣椒一边对我说，“阿塔图克当年费了很大劲儿改革土耳其的文字，就是为了提高识字率，如今又倒退回去了，再

这样下去，土耳其的经济竞争力将大幅下降。”

穆拉德拿了份报纸给我看，我虽然看不懂土耳其文，但明显感觉信息量很小，因为报纸上大都是图片，文字极少，就连一篇专栏性质的文章也不超过50个单词，和中国报纸有着天壤之别。

“越是文盲，信教的比例就越高。100年前的奥斯曼臣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世俗化，大家全是虔诚的穆斯林，阿塔图克通过强硬手段硬是把这个状况扭转过来了，这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依靠专制制度来压迫宗教也不太好吧？现在的政府起码给了老百姓信教的自由，民主国家不都这样吗？”我问。

“你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本质。阿塔图克并没有取缔宗教，只是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开了；而且阿塔图克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给了各种

宗教相同的生存空间，现在的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推广宗教，但它有偏向，只让逊尼派自由发展，对其他教派则全力打压，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吃完午饭，我们从桥上过河，来到西岸的一座名为尼兹普（Nizip）的城市，穆拉德的姐姐住在这里。这是一座中等城市，大概相当于邯郸在中国的地位。市中心不大，马路两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筒子楼，临街的一层则被改装成商店。如果不是街上行人中有不少戴头巾的妇女，这里几乎和任何一座中国内地城市没什么两样。

我正想着，耳边突然传来了诵经的声音。两幢居民楼之间居然有个清真寺，尖塔上安装了几个高音喇叭，诵经声就是从喇叭里传出来的，那声音在楼板之间来回反射，相当刺耳。

穆拉德的姐姐住在四层，电梯正好坏了，我们

只好走楼梯，可楼道的电灯也坏了，黑乎乎的。穆拉德一个劲儿地道歉，可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很多中国中小城市的居民楼都是这个样子的，那种感觉太熟悉了。

但是，当我走进他姐姐的家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家一共有250平方米，光是客厅就有两间，一间是招待客人用的，除了沙发和茶几外什么电器都没有，墙上还挂着两幅用阿拉伯文抄写的《古兰经》片段，另一间是家里人自己用的，有电视，有音响，和中国老百姓家的情况非常相似。她家只有三口人，丈夫卡迪尔（Kadir）是个农民，依靠祖传的一块地生活。她自己不工作，照顾一个上高中的女儿。他们没有买房，这是租来的房子。房间无论大小都非常干净，这也是一般穆斯林家庭共有的特点。

“我们家境很普通，在尼兹普也就算是中等

吧。”她补充说。

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开车带我去参观农场。我再次被震惊了，原来他从父辈那里继承了200公顷（约合3000亩）的土地，可惜大都是坡地，只能用来种无花果。他还开了个养牛场，养了200多头奶牛，饲料都是从供应商那里买来的，牛棚里设施非常先进，从喷水降温到除粪全都实现了自动化。

养牛场雇用了6个伙计，其中最小的一个才初中毕业，他不想读高中了，小小年纪就出来工作。“这种情况在土耳其很常见，读书其实并不是土耳其人的传统。”穆拉德偷偷告诉我。

卡迪尔是个典型的土耳其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是个虔诚的穆斯林。牛圈的外墙上用土耳其语写着“真主保佑”。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穆拉德继续跟我控诉新政府的宗教政策，卡迪尔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我好几次故意把战火引到他身上，问

他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激进的妻弟，每次他都只是笑笑，不说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待穆斯林是有偏见的，像今天这样的情景我在许多西方国家也经常见到，基督徒和无神论者完全可以坐在一起讨论家长里短，从来没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到了伊斯兰教这里就会觉得有些异样呢？

聊到最后，穆拉德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虽然我骂了半天，但我心里很清楚，土耳其已经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不可能像某些阿拉伯国家那样，退回到宗教激进派当政的状态了。"

喝完茶，卡迪尔带我上山参观他的无花果园，这地方的土壤质量确实很糟糕，全是小石子，耕作起来非常困难。事实上，整个土耳其南部都是如此，所以这里的土耳其农民很早就改种无花果了。卡迪尔不但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土地，就连果树都是祖上留下来的。树与树之间的间距很大，看上去很

浪费，但这种安排便于用拖拉机犁地。因为种树的缘故，周围所有的山都是黄颜色的，看上去触目惊心。

“为什么一定要犁地呢？难道你们不担心水土流失吗？”我问。

“过去这里很少刮风下雨，我们不担心。可最近几年气候变了，又刮风又下雨，土壤的养分损失很大。”卡迪尔无奈地说，“也许祖上留下来的办法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情况了，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正说着，我看到地上有块绿色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块陶器碎片，上面还留有花纹。“这是古罗马时期的陶片。”卡迪尔肯定地说，“这块地原来是罗马人的陵墓，我每回翻土的时候都能翻出很多这种东西。”

确实，要是比历史的话，还真没几个国家能比

得了土耳其。但也许正是因为历史太悠久了，土耳其一直是背着包袱在前行。

## 加济安泰普的野心

离开卡迪尔的农场继续往西走，沿途满眼都是无花果树，以及夹杂在其间的少许橄榄树。无花果树的树冠很漂亮，像一口倒扣的钟，相比之下，橄榄树的树冠是分叉的，很像一个梳着分头的小流氓，难看之极，三毛作词的那首《橄榄树》实在是骗了很多人。

我要去的加济安泰普（Gaziantep）是土耳其南部最大的城市，其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土耳其的正中间，其地位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武汉。当车子驶近郊区的时候，路边的景象把我惊呆了。只见一片黄色的沙漠中突然出现一群高楼，无论式样还是外观

颜色全都一模一样，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钢筋丛林。更绝的是，每幢楼顶上都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太阳能热水器，好像树顶上开满了花，样子非常滑稽。



中东最大的进出品商品集散地加济安泰普。这里的集市货品十分丰富

“加济安泰普是土耳其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这两年涌进来大批人口，房子不够住了，只好向郊区扩张。”我的地陪阿依库特（Aykut）向我介绍说，“土耳其人都说加济安泰普是土耳其的中国，因为这里的制造业非常发达。这里还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出口到中东的商品很多都是经过这里运出去的。”

阿依库特是加济安泰普一家报纸的老板，他今年60多岁，皮肤较白，长得和西欧人完全一样，再加上他年轻时曾经在英国留学很多年，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和他交谈时我完全没有身在土耳其的感觉。

据他介绍，加济安泰普的制造业以纺织品和食品为主，目前有超过10万名工人在这里的4个工业中心做工，去年的出口总额超过了5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2009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将加济安泰普

评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10个城市之一，是土耳其唯一上榜的城市。而那份榜单的前三名都是中国城市，分别是广州、重庆和南京。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你们中国，因为大家都是搞制造业的，而你们的人口多，劳动力素质高，价格低，我们打不过你们。”阿依库特说，“土耳其流传一个笑话，说我们总统派了2000万士兵去攻打中国，中国领导人听说了这件事，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给他们找旅馆。”

阿依库特带我去参观位于市中心的集市，从店铺的格局到里面卖的货品都和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小商品市场毫无区别。“我至今记得去年我妻子让我买台吹风机，家里那台坏的吹风机是土耳其产的，价值75土耳其里拉，结果我到集市里一看，中国进口的只要7.5里拉！这台中国产吹风机我一直在用，效果和原来那台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任何

一种商品，只要你们中国人开始做了，土耳其本土做同样东西的厂家立刻就得倒闭。”

阿依库特请我在市中心的一家名叫Iman Cagdas的餐馆吃饭，这家饭馆是加济安泰普最有名的饭馆，每天饭点时都挤满了人。阿依库特似乎很有面子，老板专门出来迎接，并给我们挑了一个最好的位子。坐下不久，服务员便端上来酸奶烧茄子、羊肉香肠、碎肉烤饼等各种拿手菜，以及一大堆新鲜蔬菜和小吃，最后又端上来一盘加济安泰普最有名的无花果仁蜜饼（Baklava），用当地出产的小麦和无花果做的，香甜酥脆，让人欲罢不能。这家餐馆做的蜜饼极有名，每盒2.2公斤，在伊斯坦布尔的零售价是50欧元，分开单卖的话更贵，是加济安泰普的名片和创汇大户。

“上世纪末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家只卖午饭的小餐馆呢，因为当时加济安泰普经济很差，没人出去

吃饭，旅游业也很糟糕，没有游客。”阿依库特说，“当时正赶上附近修水库，挖出一座古罗马时期的古城，但因为马上要开闸放水，古城将再次被淹没。我听说了这件事，便邀请我的一位好朋友、波士顿大学教授史蒂芬·金泽尔（Stephen Kinzer）来加济安泰普参观。他是《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回去就写了篇文章介绍这个古罗马遗址，称其为‘第二个庞贝’。2000年5月的一期《纽约时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年就吸引了超过5000名外国游客来此参观，加济安泰普一下子就出名了，Iman Cagdas餐馆也跟着火了起来。”

这个阿依库特果然不简单，很懂得利用国际舆论为自己的家乡造势。加济安泰普市政当局也很聪明，他们立刻拨出专款修建了一座博物馆，把出土的古罗马镶嵌画运到这里展出，并从文物中挑了一幅面容忧郁的女人头像重点推广，称其为“吉卜赛

女郎”。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名片，到处都能看到她的仿制品。

今年是土耳其的中国年，阿依库特想借此机会重复当年的奇迹，便邀请我访问加济安泰普。此后的几天里，他带着我去各处参观，与各种领导见面，我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很多场景都非常熟悉。比如，市中心的轻轨沿线铺着绿塑料做成的假草坪，路边乱停车现象很严重；街边有很多本地人开的品牌店，却都爱起洋名；居民区周围环境很不讲究，但家里都布置得非常考究；普通老百姓很爱国，喜欢看反映奥斯曼帝国生活的宫廷剧……

但是仔细观察，我也看到一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这里的领导们虽然也很爱打官腔，但也有几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干练的年轻官员；这里烟民很多，但几乎没有人在室内抽烟；公交车很挤，但等车的人自动排成一排，很少有人加塞……这些特

征，在埃及和突尼斯都是见不到的。

“土耳其毕竟实行了民主制度很多年，再加上凯末尔党人多年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政策，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宗教激进主义那一套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聊起伊斯兰教的现状和土耳其的未来，阿依库特和穆拉德的看法非常相似。不过他也对土耳其现在的宗教状况感到担忧：“我是穆斯林，但我也很讨厌每天用大喇叭播放祈祷词，不喜欢有些穆斯林名义上不喝酒，但偷偷买酒回家喝，这种撒谎行为才是最大的不敬，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这么做。”

据阿依库特估计，土耳其目前有25%的人属于像他这样的自由派，另有15%的宗教激进派，其余的都是墙头草。但土耳其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他所担心的只是宗教势力介入政治。“宗教自由这个口号在土耳其不是针对民众的，而是针对政府

的。”他对我说，“我们报纸曾经刊登文章批评政府的宗教政策，结果遭到了官方的迫害。我认为伊斯兰教和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想把这两者混起来，我不认为这么做能成功。”

我在加济安泰普的最后一天，阿依库特带我去了趟土叙边境，参观设在那里的叙利亚难民营。整个营地用铁丝网围起来，里面是一排排的白色帐篷，环境倒是非常干净，但很难想象里面的生活。我到的时候看见很多小孩在外面玩，大人们则躲在帐篷里聊天。几个叙利亚年轻人看见了我，冲上来对着我愤怒地挥拳头，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懂英文的人，我解释说我是记者，这才逃过一劫。这位翻译把我引到一座帐篷里，一群愤怒的年轻人抢着跟我说话，控诉政府军对他们的迫害。其中一人拿出手机给我看上面存着的照片，拍的是一座村庄被洗劫

后留下的一排排尸体。



加济安泰普当地一家报纸的老板阿依库特

“土耳其人有个笑话：我喜欢所有的叙利亚人，除了你们的总统。土耳其和叙利亚原来都属于奥斯曼帝国，两国边境是人为划分的。这场内战爆发前两国边境挤满了做生意的人，热闹极了。”阿

依库特对我说，“可是你看看现在，两个国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这就是民主化和世俗化带来的差别。任何人只要看看叙利亚就会明白，土耳其是不可能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了。”

# 被管理的现代性：建立与逆转

## ——专访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

◎袁越



訾涛

1938年11月10日，“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因病去世，享年57岁。凯末尔一生没

有留下子女，他在战争中的助手伊斯梅特·伊诺努接替了他的职位，顺利当选新一届总统，同时出任共和人民党主席。

伊诺努继承了凯末尔的外交路线，“二战”时明智地选择了中立，战后则迅速抛弃了苏联，与欧美结盟，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并和以色列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系列行动帮助土耳其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中拿到了2.59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土耳其经济在欧美的帮助下得以迅速起飞。

土耳其的政治改革比经济腾飞来得还要迅速。凯末尔去世后的第二年，共和人民党就召开大会，宣布党和政府职能分离，其任命不再相互结合，同时决定在议会内部成立反对党，以显示国家制度的民主性。“二战”还未结束，土耳其就开放了党

禁，短短5年时间里出现了27个形形色色的大小党派。1946年，土耳其进行了第一次多党派选举，虽然共和民主党获胜，但反对党也取得了一定的票数并进入了内阁，共和民主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被打破。1950年举行了第二次大选，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民主党争取到了土耳其农村大批传统穆斯林的支持，一举击败共和民主党，完成了执政党的和平更替，这个速度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是十分罕见的。

但是，从此以后土耳其就进入了一个政治上的混乱期，并于1960、1971和1980年先后发生了三次军事政变，三次政变的过程十分相似。有意思的是，军方每次得手后都迅速组织大选，然后把权力交还给了民选政府，因此这三次军人干政都没有对土耳其的民主进程带来巨大伤害。

1995年，又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被选上了台，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情。但这一次土耳

其军队没有依靠流血的军事政变，而只是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繁荣党藐视法庭对宗教介入政治的禁令，依法将其取缔。凯末尔主义者在这场不流血的“后现代政变”中再次获胜，世俗化政策得以延续。

2002年，土耳其政坛发生了大地震，明显亲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该党领袖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早年曾因“煽动宗教暴力”被禁止列席国会，但他后来改变了政策，避开这一话题，终于得以进入国会并成为土耳其新总理。这一次，土耳其军方没有干涉选举结果，土耳其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安全渡过了全球经济危机，获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

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土耳其新一届总统，进一步巩固了该党在土耳其政坛的统

治地位。2010年，土耳其警察发动突然袭击，逮捕了一大批军队高官，此后埃尔多安多次公开表示，要对土耳其军队历史上所有“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凯末尔主义者和亲伊斯兰派别之间经过多年的争斗，胜负的天平终于开始向后者倾斜，被西方国家称颂多年的土耳其模式完成了从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主义的过渡。

事实上，类似的戏码在中东国家曾经多次上演过，那就是权威政治推动国家的世俗化和西方化，但却在自由民主运动进行到某一程度时瓦解了自身，被纷纷兴起的传统伊斯兰势力取而代之。1979年爆发的伊朗革命就是如此，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是这样。对此现象，西方媒体表现得十分纠结，既对中东地区的民主革命表示欢迎，又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复兴忧心忡忡，但《凯末尔传》的作者安德鲁·曼格（Andrew Mango）却认

为，目前在土耳其发生的逊尼派穆斯林复兴运动是对凯末尔强力推行世俗化运动的一种正常反应，不必过分担心。

那么，这种变化对全世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有无影响？本刊记者带着这些疑问对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土耳其问题专家昝涛博士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一直被认为是中东穆斯林国家的一朵奇葩，很多人都认为土耳其是继日本之后全世界第二个实现了现代化的东方国家，请问土耳其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昝涛：**土耳其是在伊斯兰世界里最早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凯末尔党人领导的世俗化改革起了关键的作用。奥斯曼帝国一开始的改革

不存在主义之争，它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富国强兵。但在和西方接触后日益发现，它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大家团结一致，才能和人家竞争，这就涉及“我们是谁”的问题。奥斯曼精英们尝试过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都不成功，最后凯末尔党人选择了民族主义，生造了一个土耳其民族的神话出来，用这个理念把土耳其人团结到一起。

凯末尔党人的时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神话发展的极致就是“土耳其史观”，这一史观是对“雅利安史观”的拙劣改造，认为土耳其人是发源于中亚的白种人，是当时最高文明的拥有者，数千年前因为气候变迁，土耳其人向世界各地迁徙，并将自身的高级文明传播给了其他民族。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让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传统的束缚，但却又不至于丢掉民族的认同感，只要土耳其人民回到自己伟大的过去就可以

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悖论；第二，凯末尔告诉大家，土耳其人在接受伊斯兰教文明之前，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甚至西方文明也都源于土耳其，这样就从感情上解决了全盘西化可能遇到的抵触情绪，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就具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在民国时代把土耳其当做榜样，可为什么没有走上土耳其这条路呢？

**昝涛：**确实，中国在10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土耳其，康有为专门写过介绍青年土耳其革命的文章，孙中山、汪精卫和蒋介石也一直在研究土耳其，中国历史上确实有段时期是以土耳其为榜样的。说实话，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并不比土耳其更保守，比如当时曾经有过“纪年之争”，围

绕着到底是用孔子纪年还是黄帝纪年争论不休。当时人们对中华民族或者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甚至还有个“中华文明西来说”。所以，中国也像土耳其一样需要一个民族构建的过程，双方的动力是一样的，只是过程和细节上有些不同而已。尤其是中国有个反满清统治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了汉民族主义，章太炎就曾坚持建议中国应该主张汉代的传统疆域，后来又有人提出过五族共和等主张。当然了，中华民国的建立是通过权力让渡的方式取得的，清帝退位后把统治权让渡给了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从法理上继承了清王朝的国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还有一点和土耳其不同，那就是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两件事对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化改革方面，两国都曾进行了激进的变

革。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文化自宫”，比如，土耳其把文字都改了，换成了拉丁字母，但不能否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比较快地消灭了文盲，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素质。胡适曾经说过，你说要100%的全盘西化，最后也就能得到个50%，所以一开始需要矫枉过正，必须坚定不移地朝那个方向努力。你看土耳其最终也没有变成西方国家嘛。事实上，土耳其和日本的民族传统恰恰是保存得非常好的。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土耳其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两者虽然都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传统，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打破的是儒家传统，儒教一直依附于政权，得不到政权支持的话它立刻就完蛋了。土耳其革的是宗教的命，因为凯末尔党人相信伊斯兰教妨碍了土耳其的现代化。但宗教不必然依附于政府，其社会生命力是很

顽强的。你看凯末尔主义者反了那么多年宗教，伊斯兰教传统依然保持得很好。对比土耳其来看，它的世俗化改革并没有打掉自身的宗教传统，当前的所谓伊斯兰复兴是对当年世俗化改革的一个正常的反应，现在土耳其人反倒是实现了社会 - 精神结构的正常化和稳定。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说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凯末尔，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昝涛：**有些相似性。那个时代的一些人都是有权威主义的特质，而且想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自身所处的社会。但我认为，毛泽东可能更像凯末尔，毛和凯都成功了，而且两人都搞了“文化大革命”，想彻底改造自己的国家，两者风格上非常相似，只不过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最后走了两条不同的路线。另外，我觉得凯末尔和毛泽东所处的环境很不同，因为土耳其这个国

家的体量比中国小太多了，又没打过内战，在很多方面两者的可比性也比较小。



2011年5月17日，土耳其现任总理、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埃尔多安在约兹加特参加竞选演讲

土耳其之所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原因有很多。首先，土耳其本身一直是一个资本主义阵营的

国家，因为国内精英人物一直向往西方，整个国家很自然地倒向了西方；其次，土耳其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冷战”的桥头堡。土耳其的掌权者在“二战”以后顺势投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怀抱，并从那里得到过很多帮助。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凡是关心中东问题的人都在谈论“土耳其模式”，认为这是中东穆斯林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最好的样板，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昝涛**：这事大概要从10年前说起。2003年美国打赢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后，开始着手伊拉克重建，并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作为一个模式被美国官方和学术界提了出来。土耳其是“北约”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长期以来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美国的决策者们视为一个“榜

样”，尤其是针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土耳其也是美国的一个参照对象。美国国务卿赖斯2005年就曾经说，土耳其的成功证明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与民主制不矛盾。

另外，这一点也与美国人的一种意识形态有关系，他们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出现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是因为那里的人民没有实现民主化，因此，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是把推广民主制度作为首要考虑的。

但是，“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后，情况有了变化。独裁专制的世俗政权被推翻了，代替它们的却是各色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它们通过后革命时代的民主手段登上了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比如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上了台，利比亚“过渡委”欲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依据，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赢得了选举……于是西方国家开始担忧起来，觉得“阿拉

伯之春”要被伊斯兰势力接管了。

其实，土耳其的情况和“阿拉伯之春”非常相似。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土耳其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土耳其的政治版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时，亲伊斯兰教的厄扎尔当选为土耳其总统，他出身底层，安纳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以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集团都很支持他，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们则开始相对地被边缘化了。从这一时期开始，土耳其就已经逐渐疏离了凯末尔党人坚持多年的国家主义，并改变了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改革主义的一些内容，摧毁了很多凯末尔时代的禁忌。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那几个国家正在走上土耳其的老路，不过这段道路并不平坦，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消化民主化所带来的问题。可以说，土耳其模式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样板，但至于怎么走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还有一个自身国

情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凯末尔一直被土耳其人尊为国父，但凯末尔主义为什么却又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呢？

**昝涛**：说它“不堪一击”，我认为这种表述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需要放置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来看，不可简单而论。凯末尔党人所执行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等改革措施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那时的改革以欧洲的进步为榜样，为了进步，很多改革都是在国家权力的控制下进行的，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我借用过一个概念，说凯末尔党人在土耳其造就的是一种“被管理的现代性”（Guided Modernity），意思就是“追求进步，并依靠强力推行和保障之”。一旦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发生变化，比如民主制度逐渐完善，这种“被管理的现代性”必然受到挑战。事实上，即

使是在凯末尔党人当政时期，伊斯兰宗教势力对国家主义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末尔亲手建立起来的共和人民党在民主化时代竟几乎没有真正赢得过一次大选，而以伊斯兰主义为号召的保守政党，尽管遭到以土耳其军方为代表的强硬世俗势力的不断打压，却可以问鼎政权。

但是，这种变化并不能证明凯末尔主义不堪一击。凯末尔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进步主义的现代化，它有其特定的历史合理性，并确实打下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基础。今天，在一个民主化、多元化和自由主义的时代，即使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上台了，也不能就说凯末尔主义失败了，不能这么简单地采取“二元对立”的方式看问题；今天，凯末尔主义所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在土耳其也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三联生活周刊：土耳其军队的角色很有意

思。你认为埃及和突尼斯等“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军队是否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昝涛：**在土耳其模式中，军方在民主化的过程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一点与土耳其加入了北约，因此受到北约机制的约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前面说了，土耳其曾发生过三次政变，但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流血冲突，政变的目的也不是让军人上台执政，而是促成政权更迭，军人达到目的后就很自觉地退回军营，所以土耳其的几次军事政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但是，自1997年发生了不流血的“后现代政变”以来，土耳其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政变，民主制度在土耳其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通过民主的制度设计对军队进行了压制和规范，并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原因。

土耳其因为较早地实现了多党制，拥有受过非

常好的民主训练的大众政党，而在其他中东国家，这几个方面的基础都很薄弱。比如，在过去的60年里，由于政治高压，埃及的政党政治非常虚弱，基本上是依附于埃及军方的专制体制，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根本没有什么有能力的大众政党。所以，我认为土耳其的“军人保卫民主”的模式在埃及这样的国家会有不同特点，尽管目前看来“军队监国”这一现象是相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如果伊斯兰教复兴了，民主还有可能实现吗？

**昝涛：**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那个讲过“历史的终结”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经说过，伊斯兰教不一定反对民主，但与自由主义却是不兼容的。当然，他指的主要应该是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看穆斯林世界的具体情形，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的政治诉求是非常多元化的，简单来说，既有温和的，又有极端的。目前来看，我的判断是，极端主义的诉求，无论是建立教权国家还是实施恐怖主义，都不是主流。

伊斯兰的极端主义，其政治诉求与现代民主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前者的诉求是神权，后者的基础则是民权。也就是说两者的思想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在形式上可能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比如在伊朗你可以看到比较复杂的民主政治运作的现象。伊斯兰教复兴不是复古，不是回到过去，我觉得这有点儿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一样，是一个崭新的东西。伊斯兰主义是具有现代品格和气质的，从自身的立场，它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有深刻的批判，但它不是反现代的。

埃及等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虽然宗教势力有所抬头，但它们表面上也都承认民主的价

值，认真地进行宪政制度的架构设计。执政党虽然在拉选票时可能利用了宗教，但它以后面临的任务是治国，如果上台执政的话，管理一个现代国家需要现代法律和制度体系做支柱，民主的基本架构是不可能轻易被丢掉的，因此在那里不必太过担心宗教复兴的问题。西方人之所以担心这一点，大概是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的一种表现。

从另一个角度讲，宗教尽管具有政治性，但在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治理原则，它主要是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鼓吹，宣称要建立一个他们理想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如今，大多数人所追求的东西都不再是以原教旨意义上的宗教为标准，而更多的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人类基本需求，宗教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主要的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指南而已，和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越来越远的。

谈到伊斯兰复兴，我认为应该换一种角度来理

解“阿拉伯之春”国家里发生的所谓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本质：它不再是一场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运动的复兴，而是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我比较赞成一位法国学者的总结：“通过这场革命，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拥抱了现代化，这是一种符合伊斯兰主义运动所设定标准的特殊现代化，其表现形式是公民社会反对执政当局的独裁专制与贪污腐败。”

# 三联生活周刊

官网：http://www.lifeweek.com.cn/

微博号：http://weibo.com/lifeweek

微信号：lifeweek

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号：

生活

# The End

BookDNA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

http://www.bookdna.cn

新浪微博：@BookDNA本唐在线出版

微信公众号：本唐在线出版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发送邮件至 cb@bookdna.cn 指正。

成为作者，只需一步
To be an author, just one click.

BookDNA.cn